

tricontinental

NOCOLDWAR

MR
PRESS

美国正在发动 一场新冷战： 社会主义视角

序：
维杰·普拉沙德

撰稿：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罗思义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STUDIES | on contemporary
dilemmas

tricontinental

MR
PRESS

NO COLD WAR

美国正在发动 一场新冷战： 社会主义视角

维杰·普拉沙德 / 序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罗思义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 撰稿

STUDIES | on contemporary
dilemmas
September 2022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This publication is issu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CC BY-NC 4.0) license. The human-readable summary of the license is available at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目录

序言	05
维杰·普拉沙德	
 促使美国在全球加紧军事侵犯的原因何在？	09
罗思义	
 谁在领导美国走向战争？	31
黛博拉·维内齐亚尔	
 21 世纪生态和平运动之“灭绝主义笔记”	65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引言

维杰·普拉沙德

2022年5月23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了一针见血的言论。他说，与其执迷于“当下的情绪”，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应该促成一项令俄罗斯满意的和平协议。基辛格说：“除此目标之外的战争意图并不是为了乌克兰的自由，而是一场直接针对俄罗斯的新战争。”西方外交政策机构对基辛格的言论大多不屑一顾。基辛格并非和平派，但他指出危机升级的巨大风险在于，这或将导致亚洲周围降下新的铁幕，甚至可能导致西方与中俄两国发生公开且致命的战争。这种不堪设想的后果连基辛格都觉得难以承受。要知道基辛格的前上司可是大谈国际关系“狂人理论”的尼克松总统，他曾告诉基辛格，他“碰触核按钮”就是为了吓唬胡志明，逼他投降。

在2003年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前夕，我曾与美国国务院一位高官交谈。他告诉我，美国政府的流行主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收益。他解释道，一般都认为美国精英不惜让他国、或许还有本国劳动人民承担短期痛苦——战争造成国破人亡，也可能令他们遭遇经济困境。然而，如果一切顺利，这种代价将带来长期收益，即美国得以维护它二战后一直极力维护的东西，即其强势地位。他说的“如果一切顺利”这个假设令我不寒而栗。但同样令

我不安的是他在谈及谁必须受苦、谁又将获益时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华盛顿有一种恬不知耻的说法：“只要石油、金融巨头能够享受征服伊拉克的战争果实，那么让伊拉克人和美国工人阶级士兵遭受损失(乃至死亡)，这种代价就是值得的。”这种“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收益”的态度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一种典型幻想，这些人无法容忍增进人类尊严、维系大自然存续的事业。

“以短期痛苦换取长期收益”的态度决定了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与中俄两国的危险对抗升级。美国的立场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企图阻止一个看似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即欧亚一体化进程。在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西方银行业发生严重信贷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与其他南方国家一道着手建立一系列不依赖欧美市场的平台。这些平台包括2009年成立的金砖国家组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2013年宣布的“一带一路”计划。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及庞大的金属和矿产资源，加上中国的工业产能和科技能力吸引许多政治倾向不同的国家加入了“一带一路”计划，而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也很好地支撑了这些合作。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意大利、保加利亚、葡萄牙等，而德国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伙伴。

欧亚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威胁到了美国和大西洋精英的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威胁驱使美国铤而走险，不择手段地“削弱”中俄两国。华盛顿仍主要遵循旧传统，一向以谋求核优势来否定缓和策略。美国形成的核能力和核态势使其可以为了维护霸权而不惜毁灭地球。削弱中俄的战略包括：加紧发动混合战争(如制裁、信息战

等)以孤立中俄两国;并希望肢解两国，继而长期操控它们。

本册的三篇文章缜密而理性地分析了乌克兰局势所展现的长期趋势。

《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主编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列举了美国当局所谓“升级支配”策略，即为了维护其优势地位甘愿冒核冬天也就是同归于尽的危险。尽管俄美两国实际拥有的核武器数量都不少，但美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反制武力体系，自认为可以摧毁俄罗斯、中国的核武器，使它们彻底失败并臣服。这种幻想不仅出现在美国决策者的晦涩文件中，还不时出现在讨论对俄发动核打击重要性的大众媒体上。

生活在意大利的记者黛博拉·韦内齐亚尔(Deborah Veneziale)则深挖美国好战情绪的社会背景，讲述了美国各派政治精英在支持抗俄制华战略上形成合力的过程。美国的智库、军火商、政客及其写手的亲密关系网使得宪法的制衡保护机制形同虚设。美国精英阶层急于挑起冲突，以保全自己对全球社会财富的特别控制权（目前美国前400名富豪的净资产总额已接近3.5万亿美元，而以美国人居多的全球精英在非法避税港隐匿的财富近40万亿美元）。

来自“拒绝新冷战”组织的罗思义(John Ross)写道，通过乌克兰冲突，美国实质上升级了其全球军事侵犯。这场战争的危险在于，它表明美国不惜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直接对抗，而且不惜通过将中国台湾“乌克兰化”来升级对华冲突。罗思义认为，能够制约美国的因素是：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定力与决心;全球

南方对美国强加的外交政策目标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愿卷入乌克兰的冲突，因为它们亟需应对更为广泛的民生难题。颇能说明问题的是，2022年5月25日，非洲联盟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 (Moussa Faki Mahamat) 表示，非洲已成为“俄乌之间那场遥远冲突的连带受害者”。这场冲突不仅在地理空间上是遥远的，而且距离亚非拉国家的政治诉求也相去甚远。

本研究报告由《每月评论》、“拒绝新冷战”组织、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联合出品。请君抽空阅读、与朋友分享并讨论。人类的宝贵生命和地球的存续正岌岌可危，这是无法忽视的事实。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希望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不想被拖入一场由西方精英出于维护强权的偏狭心态挑起的冲突之中。我们渴望生存。

促使美国在全球加紧军事侵犯的原因何在？

罗思义

前言

乌克兰战争的一系列起因表明美国20多年来在全球加紧军事侵犯的趋势有了实质性的加快。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只针对武装力量弱小、没有核武器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军事对抗，如1999年轰炸塞尔维亚，2001年入侵阿富汗，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2011年轰炸利比亚。然而，乌克兰战争的主要导火索，即美国扬言将北约东扩至乌克兰，其意味具有本质的不同。美国明知北约吸纳乌克兰是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直接挑衅，而俄罗斯则是军力强盛、核武众多的大国。尽管此举将突破俄方红线，美国却不惜冒此风险。

美国(还)没有将自家兵力投入乌克兰战争，声称这么做将引发世界大战，可能导致核灾难。但美国事实上是进行一场针对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美国不但执意为乌克兰加入北约保留余地，而且在战争前对乌军进行训练，现在还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传递卫星

数据等情报信息。迄今为止，美国对乌军援总计约500亿美元。

美国如何将乌克兰推入战争泥潭？

至少从2014年开始，美国及其盟国就一直在让乌克兰做好战争准备，例如派遣数百名教官训练乌军。此举跟1990年海湾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的做法相似，反应了美方为达成其地缘政治目标所用的一种模式。自2014年乌克兰政变开始，俄罗斯就被有意引诱入局。当时反俄势力依靠乌克兰新纳粹分子和美国的支持在基辅掌权。那时乌军的军事实力并不算强，因为它在1991年苏联解体所开启的“改革”之后受到了重创。数十年的冷落和经费短缺导致其军事设施装备日益老化，官兵士气低落。俄共中央委员维亚切斯拉夫·泰特金 (Vyacheslav Tetekin) 说：“乌军不想战斗也无力战斗。”

2014年乌克兰政变后，政府开支从改善社会福利转向了扩军。2015至2019年，乌克兰军事预算从17亿美元增至89亿美元，占该国2019年GDP的6%。按GDP百分比计算，乌克兰的军费开支比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还多了三倍。乌国注入大量资金，修复军事装备并进行现代化改造，最终重振军队作战能力。

2014至2015年与乌冬俄语区的顿巴斯作战期间，由于战斗机几乎全都年久失修，乌克兰缺少空中战斗支援。然而，到2022年2月，乌空军已配备了近150架战斗机、轰炸机、攻击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规模也急剧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泰特金的数据，到2021年底，乌军士兵的薪资增加了三倍。增强军力增，加之在顿巴

斯附近竖起强大防御工事，说明了美国在该地区引发冲突的企图。

然而，尽管做了这些战争准备，乌军还是无法真正与俄军抗衡，在实力对比上基辅显然是弱方。美国对此并不在意，它不过是把乌克兰当成对抗俄罗斯的炮灰。根据泰特金的说法：“美国为军事化的新乌克兰设计了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征服顿巴斯并入侵克里米亚。第二种是挑动俄方进行武装干预。”

2021年12月，俄罗斯意识到受美国影响的乌克兰对其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于是向北约寻求一系列安全承诺以化解危机。俄方特别要求北约结束东扩，不再考虑吸收乌克兰。泰特金写道：“西方……没有理会这些要求，它们知道乌方在为入侵顿巴斯大肆准备。乌军在顿巴斯附近集结了大部分战备部队，兵力高达15万，可在几天内突破当地军队的防守，彻底破坏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并造成数千人死亡。”¹

乌克兰战争是美国军事侵犯的实质性升级

因此，无论是美国坚持乌克兰“有权”加入北约的基本政治事实，还是美国为乌克兰增强军力的军事事实都表明，美国准备在乌克兰制造对抗，而不顾与俄方发生冲突的必然。因此，评价乌克兰危机的关键在于，要注意到美国已准备好将其军事威胁从单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威胁升级为针对俄罗斯等强国的军事挑衅。前者都是非正义的，但不可能直接导致与大国的军事冲突甚至世界大战，而后者则真有可能引发全球军事冲突。因此，关键是要分析美

国军事侵犯升级的原因。这种升级只是美国恢复和解路线之前的权宜之计，抑或军事持续升级是其长期国策？

这一问题对所有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仅举一个重要例子，在对俄罗斯加紧军事挑衅的同时，美国针对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强征关税，利用所谓新疆问题为其外交政策目的在国际上大造声势，而且还妄图破坏有关中国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

美国与中国台湾有关的行动包括：

- 拜登总统在中美建交后首次邀请台北方面的代表出席总统就职典礼。
-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美国政坛三号人物（按总统继承顺序）南希·佩洛西窜访台北。
- 美国呼吁台北方面参与联合国。
- 美国加大了对台出售武器装备的力度。
- 美国访台代表增多。
- 美国在南中国海增加军事部署，频频派遣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 美国特战部队训练过台湾地面部队及海军士兵。

与俄乌冲突的情况一样，美国深知一个中国政策事关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自尼克松1972年访华50年来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抛弃这一政策就是越过了中国的红线。所以显而易见，正如美国决意在乌克兰故意突破俄罗斯的红线一样，它试图以挑衅的方式破坏

一个中国政策。

有关美国对中俄两国的挑衅是暂时还是长期甚至是永久的问题，笔者的明确结论是，美国军事升级的趋势将延续下去。但是，鉴于这一问题可能涉及战争，性质极其严肃，实际后果极为严重，夸大和单纯的宣导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本文的目的是理性、客观、冷静地阐述美国在下一阶段将继续加紧军事侵犯的原因。此外，我将厘清对美国这一危险政策构成抗衡和促进作用的趋势。

美国经济、军事地位在新旧冷战时期的对比

归结到关键事实，美国的军事侵犯政策已持续了20多年，现在促使它不断加码的主要因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美国经济在全球生产中的压倒性优势已一去不返；其次，美国军力和军费仍具有绝对优势。这种失衡将使得人类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美国在此期间可能试图通过使用武力来弥补相对的经济衰退。这既有助于解释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打击，也能说明它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对峙升级的原因。关键在于，美国的这种军事侵犯是否会进一步增加，包括增强与中国的对抗，甚至不惜发动世界大战。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情况做出准确的分析。

首先来看经济。1950年，第一次冷战前夕，美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7.3%。相比之下，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苏联的GDP占世界总量的9.6%。换句话说，美国的经济总量几乎是苏联的三倍。² 在二战后的整个时期（第一次冷战），苏联GDP从未接近过美

国，1975年仅相当于美国的44.4%。也就是说，即使在苏联相对经济成就的巅峰时期，美国经济规模仍然是苏联的两倍多。在整个旧冷战期间，美国在经济上明显领先于苏联，至少以传统产值衡量就是如此。

再谈现在的情况。与1950年相比，美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要低得多，根据不同的计算方式，大约在15%到25%之间。中国作为美国如今的主要经济对手，更接近与美国持平的程度。即使按跟随币值波动、与实际产值无甚关系的市场汇率计算，中国GDP已经是美国的74%，远高于苏联曾达到的水平。此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远超美国已有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它将继续逼近美国。

以购买力平价 (PPP，考虑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 计算，也就是安格斯麦迪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衡量标准，到2021年，美国仅占世界经济的16%，即世界经济中有84%不属于美国。以相同标准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比美国大了18%。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购买力平价预测，到2026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至少比美国大35%。中美之间经济差距远小于前苏联与美国的差距。

就算考虑到其他因素，无论怎么衡量，中国迄今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在最新可查数据时点的2019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8.7%，而美国为16.8%。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量中的份额比美国高出70%以上。而前苏联在制造业产量方面从未赶上过美国。

再看货物贸易。美国在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中败给中国，这

对特朗普和美国来说多少有些丢脸。2018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量已经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不过当时中国货物贸易量仅比美国多10%左右。到2021年，中国的货物贸易超过美国31%。在商品出口方面，美国的情况更糟：2018年，中国的出口额比美国高出58%；到2021年，中国的出口额高出美国91%。总而言之，中国不仅已成为迄今为止世界第一大商品贸易国，而且美国在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发起的贸易战中也遭受了明显挫败。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更为根本的是中国在储蓄（家庭、企业、国家）方面的领先优势，这是实际资本投资的来源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根据现有最新数据，2019年中国的资本储蓄总额按绝对值计算达到6.3万亿美元，比美国的4.03万亿美元高了56%。但该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的优势：一旦考虑货币贬值，中国每年资本净增量为3.9万亿美元，比美国的0.6万亿高出635%。总而言之，中国的资本存量年年都在大幅递增，相对而言美国的增量就很少。

这些趋势的最终结果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压倒性地超过美国，不仅仅是自1978年以来的整整40年间，而且一直持续到最近。以通胀调整后的物价计算，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前一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了24%，而中国经济增长了177%，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七倍。在相对和平的竞争领域，中国一路凯歌。³

美国在生产力和科技、公司规模方面的领先意味着总体上其经济仍强于中国，但两国之间的差距远小于美苏之间的差距。此外，无论这两个全球大国的相对经济优势各是什么，很明显，美国已经

失去了其全球经济主导地位。从纯经济角度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世界多极化时代。

经济衰退时期的美国军事

美国的经济退步导致一些人，特别是西方某些圈子里的人认为美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已经发生了。中国也有少数人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综合实力已经超过美国。这些观点是不正确的。他们忘记了列宁的名言：“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还有毛主席关于政治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美国正失去经济优势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容忍这种经济趋势安然持续下去。如果作这样的假设，就犯了让经济优先于政治的错误。美国相对于中国等国的经济失利反而促使它采用军事手段以及与军事相关的政治手段来弥补经济挫败的后果。

更准确地说，其他国家的危险在于美国并没有失去绝对军事优势。事实上，美国的军费开支比排在其后的九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只有在核武器领域才有一个国家与美国旗鼓相当，这就是俄罗斯，因为它从苏联继承了核武器。各国拥有核武器的确切数量通常是国家机密，但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做出的西方权威估计，截至2022年，俄罗斯拥有5977枚核弹头，而美国拥有5428枚。俄罗斯和美国各拥有约1600枚现役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但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数量远多于中国）。⁴ 此外，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开支远高于其他

任何国家。

美国在经济地位和军事地位上的落差是其侵略性政策的根源，美国在当前新冷战和对苏旧冷战中的经济、军事地位也因此产生明显区别。在旧冷战时期，美苏军事实力大致相等，但前面已经说过，美国经济规模大得多。因此，美国在旧冷战时期的战略是试图将问题转移到经济领域。哪怕是里根政府1980年代的军备扩充也不是为了对苏联发动战争，而是逼苏联参与军备竞赛，以损害其经济。因此，尽管局势紧张，但冷战从未转变为热战。而美国目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它的相对经济地位已经大为削弱，但军事力量仍旧强大。因此，美国试图将问题转移到军事领域，这就解释了其军事侵犯升级以及该趋势将持续下去的原因。

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美国或许正在输掉和平的经济竞争，但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的军事优势。这就会诱使美国诉诸于“直接”和“间接”的军事手段来试图阻止中国的发展。

美国军事力量的直接和间接使用

美国会使用“直接”和“间接”两种手段来展示其军事实力，这比对中国发动正面战争这种“直接”的极端可能性更大。有些方法已经付诸实施，有些方法还在讨论。已经实施的方法比如：

- 令其他国家服从美国军方，并试图迫使这些国家对中国采取更为敌对性的经济政策，德国乃至欧盟就是这种情况。
- 试图逆转世界经济业已形成的多极化特征，建立由美国单边

主导的各种联盟。北约、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等多国联盟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

- 试图迫使与中国经济关系良好的国家削弱这种关系。澳大利亚的情况就特别明显，其他国家也正在受到蛊惑。

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讨论对中俄的盟友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试图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拉入对美国的“有限”战争。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美国政治评论员贾南·加内什 (Janan Ganesh) 举例说明了美国对直接和间接军事压力的综合使用，解释了“美国将成为乌克兰危机最终‘赢家’”的道理。加内什写道，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还不到三天，德国就加快推进国内首批两个液化天然气终端的建设。到2026年，由于地理和政治上更近，美国或将成为德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以此消除德国对俄罗斯能源进口的依赖。加内什还认为，德国增加国防预算的承诺也将使美国受益，因为德国将为美国“分担更多的北约财政和后勤成本”。最后，他指出美国或将获得一个巨大优势：

一个更依赖美国但更少消耗美国的欧洲。克里姆林宫决定通过意外事件实现的目标连基辛格都无法预测。乌克兰战争非但不能终结美国重返亚洲的态势，反而会起到促进作用。

至于亚洲，如果中国的目标是至少消除美国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那么过去六周就证明了这一任务的艰巨性。日本不遗余力地支持基辅，因此就是支持华盛顿的。⁵

简而言之，美国运用军事压力迫使德国和日本在经济上服从

它。虽然可以预见不少其他变相方式，但它们的共同特征是美国企图利用其军事实力弥补其削弱的经济地位。如此理解，显然美国已经开始实行直接和间接使用军事力量的基本政策。

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美国，其军事实力可能终将追平美国。然而，中国需要很多年时间才能建立起与美国相当的核武库，即使中国开始执行这种策略。在常规军备方面，由于先进的海空部队需要大量的科技进步和人员培训等等，中国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赶上美国的水平。因此，在未来很多年，美国将在军事力量方面继续保持对中国的优势，这为美国以军事手段弥补经济地位下降提供了持久的诱惑。

乌克兰战争的意义

从乌克兰战争的起因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教训。

首先，它证实了向美国寻求同情是没有意义的。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17年中，俄罗斯奉行尝试与美国交好的政策。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俄罗斯向美国卑躬屈膝。普京执政初期，俄罗斯向美国所谓反恐战争及其入侵阿富汗提供了直接援助。而美国的回报却是违背其关于北约不向俄罗斯推进“一寸土地”的承诺，同时积极增加对俄军事压力。

其次，这种态势表明，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不仅对俄罗斯至关重要，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至关重要。俄罗斯是唯一在核武器方面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而中俄的良好关系是对美国的一大震慑，

使其不敢采取直接攻击中国的政策。美国在乌克兰的企图恰恰是要促使俄方政策发生根本改变，在莫斯科催生一个不再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政府，一个与中国作对、听命于美国的政府。这一企图一旦得逞，不仅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将大大增加，而且中国北方与俄罗斯的漫长国界也将成为战略威胁；中国北方将被包围。换言之，中俄两国的国家利益都会受到损害。用欧亚经济联盟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执行机构的俄罗斯专员谢尔盖·格拉济耶夫 (Sergei Glazyev) 的话来说：“美国人没能通过贸易战直接削弱中国，又将主要打击目标转向了俄罗斯，他们认为俄罗斯是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盎格鲁-撒克逊人企图散布他们一如既往的恐俄思想来摧毁我们的国家，并同时削弱中国，因为中俄的战略联盟对美国来说太厉害了。”⁶

美国的军事行动及其面临的限制

受到经济地位下降和军事优势的合力推动，美国的军事侵犯范围在“内部”（国内）层面是没有底限的。历史表明，美国愿意进行极端暴力的军事侵犯，甚至不惜毁灭一整个国家。举例而言，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将朝鲜所有城镇几乎摧毁殆尽，包括大约85%的建筑。

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轰炸规模更大，期间使用了爆炸装置和化学武器，例如臭名昭著的橙剂，它会导致可怕的人体畸形。1964年到1973年8月15日，美国空军在印度支那投下了超

过600万吨炸弹，而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在东南亚又投弹150万吨。迈克尔·克劳菲特 (Micheal Clodfelter) 在《空中力量的极限》(The Limits of Air Power) 一书中指出：

投弹量远超二战和朝鲜战争的消耗。美国空军在二战和朝鲜战争中共消耗弹药215万吨，其中二战欧洲战区为161.3万吨，太平洋战区为53.7万吨，朝鲜战争为45.4万吨。⁷

爱德华·米格尔 (Edward Miguel)、杰拉德·罗兰 (Gerard Roland) 在对越南轰炸长期影响的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同一观点，指出：

因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轰炸（按重量计）至少是二战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轰炸总和的三倍，约为朝鲜战争轰炸总吨数的15倍。鉴于越南在战前的人口约3200万，美国在战争中投放的炸药人均数百公斤。还有一组对比，在广岛和长崎投放的原子弹威力约相当于1.5万吨和两万吨TNT炸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轰炸量是广岛和长崎原子弹威力总和的100倍。⁸

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曾使用贫化铀等恐怖武器，意图摧毁该国（实际上也做到了）。在美国发动袭击多年后，贫化铀仍是当地新生儿先天性缺陷的罪魁祸首。2011年，美国轰炸了利比亚，把这个曾是非洲人均收入靠前、福利完备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部落冲突不断、公开贩卖奴隶的社会。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简而言之，证据表明，美国并不准备收敛其罪行与暴行。如果美国想象可以通过发动核战争来消除中国的经济挑战，那么没有证据表明它不会出此下策。此外，虽然美国国内势必会有反战运动，但

其声势远不足以阻止美国动用核武器的决定。美国的内部约束不足以阻止它对中国发动战争。

但是，如果美国的军事侵犯没有根本的内部约束，那么一定有很大的外部约束。首先是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正因为如此，中国1964年第一次核弹试爆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国家的一项伟大成就。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对美国核攻击的根本威慑。然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显示出其克制和防御性的军事姿态。

一场涉及美、中、俄的全面核战争将是史无前例的军事灾难。这样的战争至少将导致数亿人丧生。毋庸置疑，必须阻止美国军事侵犯升级，以防其发展到那种地步，但阻止成功的机会有多大？

美国二战以来的总体政策趋势呈现出一条清晰逻辑线。即当美国感觉自己处于强势地位时，其政策比较有侵犯性；当它感觉地位弱化，就趋于缓和。最明显的表现是在越南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但在其他时期也是如此。

二战刚结束时，美国自认为、也确实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敢于对朝鲜发动战争。即使未能赢得这场战争，美国仍有足够信心在1950年代和60年代试图在外交上孤立中国，剥夺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阻止直接外交关系等等。然而，美国因越南战争失败而遭遇重大挫折，它无法击败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来自中苏的大规模军事支持。越战失败削弱了美国全球地位（甚至在1975年战争正式结束之前就开始了），美国因而倾向于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

标志性事件是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随后中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1972年之后不久，美国开启了对苏联的缓和政策。然而，到了1980年代，美国从越战的失败中缓过来后，在当时的里根总统的领导下又对苏联采取了更有进攻性的政策。

在2007/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同样可以看到美国强时进攻、弱时求和的模式。这场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因此美国开始强调国际合作。汇聚了全球各大经济体、代表三分之二人口的20国集团成立于1999年，但直到2007/08年经济危机后才开始举行年度会议。2009年，20国集团承诺成为推动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主要力量，美国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尤其是，当美国感到实力受到削弱后，在这些领域对中国表现出了更加合作的态度。

当美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恢复元气，对华姿态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最终导致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也就是说，一旦美国感到自己更强大，它就会变得咄咄逼人。

当今与二战前的情况比较

谈到历史比较，我们可以把目前的形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时期进行对照。引发二战的直接原因最早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及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接着是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然而，尽管这些事件是不祥之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1931年至1939年期间，同盟国国家未能抵御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导致一系

列失败和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的第一轮胜利因而演变为一场世界大战。

在1930年代的大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集中精力抗日，而是一心剿共。与此同时，美国没能出面阻止日本，直到1941年珍珠港自己遭袭。在欧洲，尽管英法有权按照《凡尔赛条约》有权阻止纳粹德国再次军事化，但是它们却没这么做。此外，1936年，它们没有支持西班牙合法政府反对由希特勒支持、佛朗哥发动的法西斯政变和内战。然后，它们又直接屈从了希特勒1938年臭名昭著的慕尼黑条约，默认其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

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与标志二战序幕拉开的1931年似曾相识。尽管一场侵略性世界大战在美国不可能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但在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和军事机构中，确实是有一小撮目前仍属边缘人物者是支持开战的。如果美国遭受政治失败，它不会直接与中俄进行正面战争。尽管如此，像1931年日军侵华和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那种中期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如在有限战争中获胜，美国或将得寸进尺，挑起全球性军事冲突。我们必须坚决斗争，防止全球冲突发生。这意味着，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美国赢得眼前的冲突，例如它挑起的乌克兰战争、利用台湾问题破坏一个中国政策的企图，以及对许多国家发动的经济战。

反对美国军事侵犯的主要力量

反对美国军事侵犯的有两股强大的力量。首先，最强大的力量

就是中国，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仅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而且能使其军事力量最终与美国并驾齐驱。这很可能是对美国军事侵犯的终极威慑。第二股强大的力量是许多反对美国侵犯的国家，包括不少南方国家，代表了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他们的反对不仅是从道义出发，而且是出于自身直接利益。美国企图利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挽回其经济失败的后果，就不免会做出伤害许多国家利益之举。

这些做法的后果有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就是，美国挑起乌克兰战争，导致世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因为俄乌两国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化肥出口国。此外，禁止华为参与5G发展，意味着跟随美国禁令的各国居民要多缴纳电信服务费。美国向德国施压，迫使其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以替代俄罗斯天然气，此举也导致德国能源价格升高。在拉丁美洲，美国企图阻止各国推行独立的国家政策。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提高了美国家庭的生活成本。其他国家的国民被迫为美国的黠武行为买单，对此类政策及其结果产生反抗是必然的。

中国自身的发展、美国政策有悖全球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实，这两股力量相辅相成，构成了美国军事侵犯的主要障碍。因此，将中国的发展与反抗美国打压的国际力量结合起来，是全球大多数人的当务之急。虽然我们不在中国，无法完全理解中国领导人面临的复杂情况，但可以说，他们肩负着重大责任，不仅要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促进地球可持续发展，而且要兑现革命的承诺，让工农大众为

中国达到如今的国际地位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得到褒奖。

美国面临的选择

美国在丧失经济优势的同时转而加紧军事侵犯的过程已经启动了。美国在乌克兰直接胁迫拥有强大核武器的俄罗斯，核战争引爆的潜在风险变大了。美国同时还对德国等盟友极力施压，迫使它们以损害自身利益为代价服从美国的政策。

然而，美国仍忌惮全面动用军事力量，看来是在权衡军事侵犯升级的收益和风险。尽管美国通过扬言将乌国纳入北约、从而为其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和情报，因而挑起了乌克兰战争，但它还不敢在战争中直接投入兵力，这表明美国国家机器的顶层仍举棋不定。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中俄之间的关系，也使得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由于中俄友好的关系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构成了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障碍，美国政策的核心战略目标是离间俄罗斯和中国。如能得逞，美国将更有能力利用军事实力等手段各个击破。

结论

美国将加紧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犯行动，不仅在经济领域，还会直接、间接使用其军事力量，只有在失败时才会踌躇不前。我们当然要利用美国每一次寻求和解的机会，但必须明白，当美国在挫败期间的策略是企图重整旗鼓，以待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政策。

要击败美国的侵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全面发展，这也符合其他受美国侵犯国家的利益。除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之外，阻碍美国侵犯的最重要力量是，世界上大多数人以及受美国政策连累的国家对于美国侵犯行为的反抗。美国直接和间接军事侵犯的强度取决于美国在局部对抗中的失败程度。越得手，它就越有侵犯性;越是被削弱，它就会越会求和。

因此，从短期看，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关乎更广泛的地缘政治现实。尽管我们无法洞见美国侵略性外交政策的细节，但在其经济疲软和军事优势的共同作用下，其军事侵犯在总体上显然是升级的，除非遭遇重大挫折。

[illegible]

1. Vyacheslav Tetekin, “How the US Pushed Ukraine into the War, ” Communist Part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pril 4, 2022, <https://cprf.ru/2022/04/how-the-us-pushed-ukraine-into-the-war/>. 本节中的引述和分析均来自此来源。
2. 见 Angus Maddison, *The World Economy: A Global Perspective*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1)。请注意, 其他来源估计的 1950 年美国 GDP 全球 GDP 份额要大得多, 超过 40%。中美经济表现的比较数据摘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22 年 4 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数据库。
3.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2/>, April;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International Data, [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62&step=1#reqid=62&step=9&isuri=1&6210=](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62&step=1#reqid=62&step=9&isuri=1&6210=1a796f748c23)
- 4;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4.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Status of World Nuclear Forces, ” 2022, <https://fas.org/issues/nuclear-weapons/status-world-nuclear-forces/>
5. Janan Ganesh, “The US will be the ultimate winner of Ukraine’s crisis, ” *Financial Times*, April 5,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cd7270a6-f72b-4b40-8195-1a796f748c23>
6. “Events like This Happen Once a Century” : Sergey Glazyev on the breakdown of epochs and changing ways of life, *The Saker*, 28 March 2022, <https://thesaker.is/events-like-this-happen-once-a-century-sergey-glazyev-on-the-breakdown-of-epochs-and-changing-ways-of-life/>
7. Micheal Clodfelter quoted in Edward Miguel and Gerard Roland,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1), 2011: 1-15. https://eml.berkeley.edu/~groland/pubs/vietnam-bombs_19oct05.pdf

8. Edward Miguel and Gerard Roland, “The Long-run Impact of Bombing Vietnam, ”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6 (1), 2011: 1–15. https://eml.berkeley.edu/~groland/pubs/vietnam-bombs_19oct05.pdf

谁在领导美国走向战争

黛博拉·韦内齐亚尔

世界正在感受美国日益浓烈的战争恶意。¹ 在乌克兰冲突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美国与北约不断升级与俄罗斯的代理人战争，同时也不忘继续加紧对中国的围堵和挑衅。这种战争意图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5月15日《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 节目中展露无遗，其中一个环节模拟了美国对华战争。² 值得注意的是，组织这种“战争游戏”的是“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这是一家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智库，由美国及其盟国政府的一系列机构赞助，其中就有“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以及雷神、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波音、脸书、谷歌、微软等众多美国军事、科技企业。³

与这种战争模拟遥相呼应的是国会、五角大楼其他令人警觉的战争信号。4月5日，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Charles Richard)在国会极力渲染中俄两国对美国的“核威胁”，并称中国“很可能利用核胁迫来为自己谋取利益”。⁴不久后，4月14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代表团窜访台湾。5月5日，韩国宣布加入北约组织旗下的一个网络防御组织。6月，北约在其年度峰会上称俄罗斯是其“最重大、最直接的挑战”，并点名称中国对“我们的利益构成挑战”。此外，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首次参加北约峰会，北约的“亚洲分部”呼之欲出。最后，8月2日，美国众议长、拜登政府三号人物南希·佩洛西公然挑衅北京，在美国空军护送下窜访台湾。⁵

面对拜登政府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人们不禁要问：在美国的统治精英中，是哪些人在鼓吹战争？美国国内是否还存在遏制这种好战倾向的机制？

本文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拜登政府中，两个原本彼此竞争的外交政策精英团体自由鹰派和新保守派实现了战略合流，在精英阶层中形成了自1948年以来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共识，使美国的好战政策达到新高度；二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出于长期利益的考虑，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共识，形成了对这一外交政策的坚实支持；三是因为美国宪法的设计、极右翼势力的扩张以及选举过程的赤裸裸“金钱化”，传说中的民主制衡体制完全没有能力制约好战政策的扩散趋势。

好战派外交政策精英的合流

美国自由鹰派的早期代表包括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等民主党总统，其思想根源则可以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登上世界舞台为民主战斗”的主张。入侵越南就是这一思想指导下的行动。

越南战争失败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暂时减少了对外干涉的呼声。不过，民主党参议员、自由鹰派人物亨利·杰克逊(Henry “Scoop” Jackson，当时也被称为“波音公司的参议员”)与其他反共分子和坚定的干预派一起推动了新保守主义运动。包括杰克逊一些支持者和前雇员在内的新保守派在1970年代末支持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因为他致力于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单边主义崛起，新保守派进入美国外交政策主流，其思想领袖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曾是亨利·杰克逊的助手。1992年，在苏联解体后仅几个月，当时分管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沃尔福威茨就提出了《国防政策指南》(Defense Policy Guidance)，明确主张美国要确立永久“独角兽”地位。他解释说，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扩展到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及其所有周边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大国重新崛起。通过武力投射保持美国主导的单极态势，这一战略指导了布什父子、克林顿、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美国之所以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联的虚弱。随后，美国和北约武力肢解了南斯拉夫。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完全被新保守派控制，如

副总统迪克·切尼 (Dick Cheney)、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Rumsfeld)。

尽管自由鹰派和新保守派都积极主张对外军事干涉，两派在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区别。第一，自由鹰派认为美国应当影响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施军事干预，而新保守派往往无视多边机构。第二，自由鹰派希望联合西方盟友进行美国主导的军事干预，新保守派则不惮于发起单边军事行动、公然违反国际法。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所说，新保守派乐于接受“美利坚帝国”的称号，并作为世界霸权国单方面决定对任何国家的进攻。⁶

尽管共和党、民主党在历史上形成了各自的政策和宣传机构，认为两党外交策略截然不同的观点却是一种误解。诚然，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是新保守派的主要阵地，偏向共和党的政策，而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及后来新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等智库则有更多偏向民主党的自由鹰派人物。但是，各个智库中都有来自两党的代表，他们之间分歧的核心不在于党派门户，而在于具体政策主张。实际上，在白宫和议会的背后，由非营利基金会、大学、智库、研究团体等机构共同组成的两党政策规划网络，将企业和资本家的议题打磨成政策提案和报告。

另一个常见误解是，所谓自由主义“进步”的一面将促进社会发展、提供国际援助、限制军费开支。然而，始于197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时期一大特征就是国家服从市场力量，并对医疗、食品救济、教育等社会支出实行紧缩政策，这严重损害了民众的生活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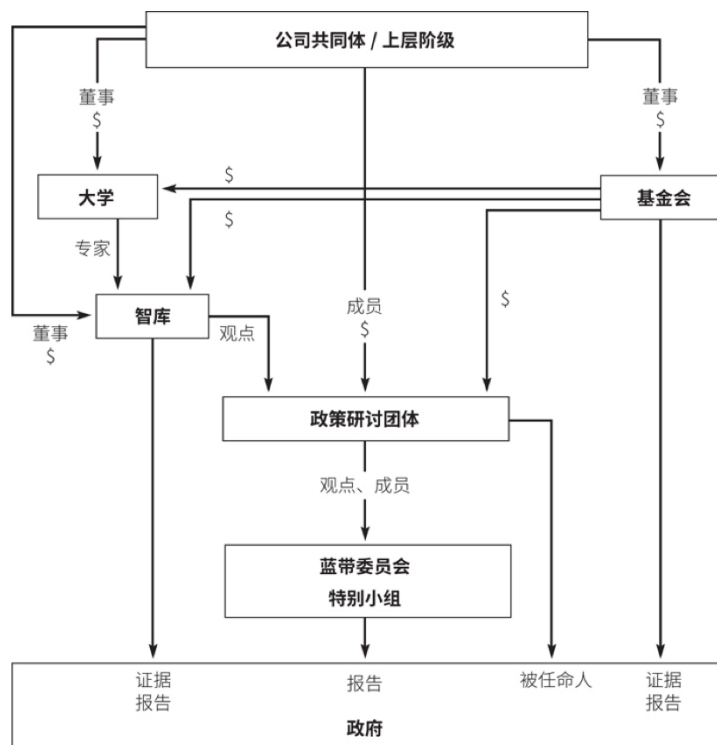
量。共和党 and 民主党都遵循新自由主义原则，拜登政府2022年预算就是一个例证，其中军事开支比上年增加了4%。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政府提供的5万亿美元刺激资金中1.7万亿直接进入了大企业的口袋。⁷ 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对全球南方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将发展中国家拖入债务陷阱，迫使他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无休止地还债。

在外交政策领域，二战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是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该智库接受统治阶级各种来源的资助。委员会中“奠基” (Founder) 级企业会员中包含了能源 (雪佛龙、埃克森美孚、赫斯、特鲁里安)、金融 (美银、黑石、花旗、高盛、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穆迪、纳斯达克)、科技 (埃森哲、苹果、AT&T、思科)、互联网 (谷歌、Meta) 等行业的领军人物。委员会目前的董事会成员中既有老布什的中东问题主要顾问理查德·哈斯 (Richard Haass)，也有奥巴马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Ashton Carter)。德国《明镜》杂志曾将外交关系委员会形容为“美国和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私人机构”和“资本主义的中央政治局”。《华盛顿邮报》称该委员会及其成员为“最接近于美国统治机构的东西”。⁸ 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政策提议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的长期战略思想，从其2022年1月“加强美日协调，应对台湾问题”的提议中可见一斑，该提议早于佩洛西同年8月窜访台湾事件。

不论这些机构里的成员在选举中支持哪一党的候选人，这个两党长期协作网络一直保持着华盛顿外交政策的稳定。该网络宣

扬“美国至上”、不允许其他国家插手国际事务的世界观，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1823年宣称美国统领西半球的门罗主义。现在的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将门罗主义的范围从美洲大陆推广到了全世界。跨政党协同和转换政党都是这个外交政策精英群体的常态，他们与执政的资产阶级及其把控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权力精英代理人、情报机构和军方等“深层政府”（Deep State）机构紧密相连。

本世纪初，在共和党中聚集的新保守派更关心对俄罗斯的分裂和无核化，未过多注意到中国。然而到了2008年左右，美国各派政治精英势力逐渐认识到，中国经济将继续强势崛起，且其未来领



政策的形成过程 (图源：《谁在统治美国?》，作者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

领导人不会向美国影响力低头，中国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的人物。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新保守派开始对中国采取完全对抗的态度，企图遏制中国。与此同时，一些亲民主党的自由鹰派成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导制订并实施了“重返亚太” (Pivot to Asia) 战略。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战略转变得到了当时还在共和党阵营的新保守派首肯。政治评论家、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马克斯·布特 (Max Boot) 赞扬希拉克为“强有力的声音”。布特曾在2003年写道：“鉴于‘帝国主义’背负的历史包袱，美国政府没有必要拥抱这个词。但它绝对应该接受这种做法。”⁹ 如今，将北约扩至乌克兰并与俄罗斯对抗的战略仍然是新保守派和自由派鹰派的优先事项。两派都不同意主张缓和对俄关系以强化抗中的“现实派”立场。

然而，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总统，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识中造成了短期动荡。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悲剧与闹剧——特朗普在白宫》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Tragedy and Farce) 一书中写道，特朗普的上台部分得益于一场以白人下中产阶级为基础开展的法西斯主义运动。¹⁰ 起初在大资本精英内部只有一小部分人支持他，包括航运巨头Uline的所有者迪克·乌伊莱因 (Dick Uihlein)、建材零售商家得宝的创始人伯尼·马库斯 (Bernie Marcus)、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 (Breitbart News Network) 的投资人罗伯特·墨瑟 (Robert Mercer)、银行大亨安德鲁·梅隆 (Andrew Mellon) 之孙蒂莫西·梅隆 (Timothy Mellon) 等人。特朗普在全球事务上的收缩

态势，尤其是从叙利亚撤军、启动从阿富汗撤军以及与朝鲜进行外交接触等举动符合中下资产阶级的短期利益诉求，也得到基辛格等外交政策现实派的支持，但让新保守派心生不满。一批新保守派精英在反特朗普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约300名前布什政府官员在2020年大选转投民主党。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马克斯·布特，他成为外交政策上的思想领袖，对拜登政府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在拜登政府下，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识得到恢复，新保守派和自由鹰派在国家战略导向上完成了彻底合流。两派共同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因而形成了数十年未见的联合。这一联合是基于一个国际事务理论，即认为美国应积极干预他国政治，全力促进“自由民主”，打击挑战西方经济、军事主导权的国家，清除不受欢迎的政府，通过一切手段确保其全球霸权，以俄罗斯和中国为其主要目标。2021年5月，国务卿布林肯（他曾在奥巴马政府任副国务卿）宣称美国要捍卫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指向了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和安全组织，而不是基于联合国的更广泛机构。布林肯的立场表明，在拜登政府下，自由鹰派已经正式放弃了追随联合国等国际多边组织的幌子，除非这些组织听命于美国。

2019年，著名新保守派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与布林肯联合撰文，敦促美国放弃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呼吁遏制（即包围、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呼吁对美国的手对手采取“预防性外交和威慑”政策，也就是就把部队和坦克送到他们认为有必要

的任何地方。¹¹ 顺便一提，卡根的妻子维多利亚·努兰德（Victoria Nuland）曾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欧洲和欧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努兰德在组织和支持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及政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吹嘘美国为在该国“促进民主”豪掷了几十亿美元。¹² 她目前在拜登政府担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这是美国国务院的第三高位，仅次于国务卿布林肯和常务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她还是自由鹰派领袖玛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的精神传人。

卡根、布林肯所支持的鹰派方向又被主张核边缘政策的北约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推进了一步。2月，大西洋理事会下属斯考克罗夫特战略与安全中心（Sn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副主任马修·克罗尼格（Matthew Kroenig）主张美国应考虑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¹³

从这个战争贩子的小圈子中，不难发现二大外交精英团体的深度融合，他们都是乌克兰危机的实际推手。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个好战集团采取策略的轨迹是：

- 强化美国对北约的领导地位，以该军事联盟（而非联合国）作为对外干涉的首要机制；拒绝承认所谓对手对于敏感区域的主权和安全诉求，以此挑衅对方开战；
- 谋划使用战术核武器，在所谓对手领土或周边进行“有限核战争”；
- 实施混合战争，以削弱、颠覆对手的政权，具体办法是：施

加单边胁迫性措施，结合经济制裁、金融、信息、宣传、文化措施以及颜色革命、网络战、法律战等手段。

如果在乌克兰取得理想的成果，同样的策略无疑会被复制到西太平洋。

战略上的一致并不意味着政策精英们在其他他们认为次要的问题（如气候变化）上没有分歧。但即使在气候问题上，美国也在要求欧洲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而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对此举的潜在负面环境影响不置一词，部分原因是美国希望取代俄罗斯向欧洲出售天然气。

近年来，世界各地的进步力量发起国际性运动，表达他们对美国进攻性全球战略的担忧，往往使用“新冷战”这一说法。不过，这些常见的说法低估了美国当前外交政策某些方面的恶劣性质。与苏联的“旧冷战”遵循了一定的规则和底线，即美国采用多种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谋求颠覆苏联政权，双方承认彼此的利益范围与安全需求。但是，美国并没有试图改变核对手的势力边界。但今时已不同往日，比如《华尔街时报》竟公然宣称美国应当展现赢得核战争的能力。这一立场受到外交政策精英的背书，他们声称乌克兰和中国台湾都是西方军事势力范围内的战略要地，必须予以保卫。¹⁴ 就连冷战领袖基辛格也对当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表示担忧和反对，他认为将中俄分而治之才是正确之道，警告美国若同时与两个核大国直接开战将导致危险后果。

美国资产阶级支持反华战争预演

华盛顿试图通过贸易战和科技战实现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这一进程由特朗普政府发起，在拜登的领导下得到延续。然而，这一政策引发了意外后果。一方面，由于全球供应链的形成，欧美制造业严重依赖从中国进口，拜登政府面临国内反对的声音，他们呼吁减免贸易战关税，以降低国内巨大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尽管中国没有发起经济脱钩，但贸易战、科技战的压力促使其推进“国内大循环”战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依靠国内消费）。新冠疫情以来，中美商品贸易额表面上看出现了阶段性上升。

但必须看到，美国对华关系的底层逻辑在发生变化：美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日益紧密的反华联盟，支持华盛顿的好战政策。这种情形的根源有经济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因素。首先，美国和其他国家的GDP数据掩盖了南方国家工厂劳动力的贡献。比如，苹果公司在美国的高盈利销售收入出现在了美国GDP数据里，但其丰厚收益的实际来源却是富士康工厂在中国深圳、重庆等城市高效廉价的先进生产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¹⁵ 从低廉非熟练工的大工厂时代一路走来，中国已发展出极为成熟的工业、物流、社会基础设施，到2019年在全球制造中占了28.7%。¹⁶ 将整个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或墨西哥或将是长达数十年的漫长过程，不能仅仅依靠更为低廉的工资。

除了芯片制造商，美国经济中很少有严重依赖在中国本土市场销售的行业。波音、卡特彼勒、通用汽车、星巴克、耐克、福特、

苹果公司没有一家来自中国的收入超过25%（苹果公司为17%）。¹⁷ 美国标普500指数企业年度总收入为14万亿美元，与中国境内销售相关的收入还不到的5%。¹⁸ 美国的首席执行官们不太可能反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方向，因为他们没有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获得长期占位的明确途径。这一态度的表现之一是，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查佩克 (Bob Chapek) 在公司2022年5月财报会议上表示即便没有中国市场也有成功的信心。¹⁹ 这种对华态度从几个重要产业中可进一步得到证实。

科技/互联网行业。在美国十大顶级富豪中有九人来自时代潮头的科技/互联网行业。唯一不完全的例外是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而他的“第一桶金”也是来自于互联网。与过去几十年的富豪排行榜对比，制造业、银行业、石油业等传统行业的富豪已被一群新晋科技精英取代。由于在打入中国市场时遭遇困难，这些科技精英具有强烈的反华情绪。谷歌、亚马逊、脸书等科技巨头在中国几无市场，苹果和微软等公司也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中国科技通讯企业华为近十年在中国市场份额上曾超过苹果公司，只是因为美国制裁华为，禁止向其出售智能手机重要部件半导体芯片，苹果才再次登顶。据称，中国政府正在采用国产Linux系统和WPS替代微软的Windows和Office。IBM、甲骨文、EMC等传统科技企业（统称为IOE）则早已因阿里巴巴推动的“去IOE”（用国产开源方案替代IBM服务器、Oracle数据库、EMC存储设备）潮流而被边缘化。美国科技巨头渴望中国政治

体制发生改变，以此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该行业的重要人物都积极推动华盛顿的敌对外交政策。谷歌前CEO和执行主席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 在2016年和2018年先后牵头成立了美国政府下的国防创新委员会 (Defense Innovation Unit) 和美国国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他大力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代表了美国科技界的普遍意见，而科技界也影响着公共话语。推特和脸书配合美国 and 西方各国政府，对批评其外交政策的声音加大了审查力度，以反对中国等对手发起“虚假宣传”的名义，影响了新冠疫情、香港事务、新疆事务等重要问题的讨论。

制造业。美国制造业仍依赖中国的产能。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美国制造业基本上放弃了持续投资和技术革新。尽管奥巴马、特朗普都呼吁让“近岸制造”回到北美，但这方面收效甚微。不过，美国制造业在华投资近年来有所减少，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但即便在这个例子里，需要注意的是，埃隆·马斯克通过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从美国政府和军方获得了大量采购项目，其“星链”卫星系统于2021年两次接近中国空间站，被中方批评。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告说，美国或将对星链系统进行军事化应用。将星链服务用于乌克兰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动向。马斯克对推特的潜在收购不太可能改变推特与美国和西方各国政府的关系及其针对中俄的态度。

金融业。美国金融服务业一直期待中国资本市场向他们进一步

开放，他们的终极希望是中国发生政权变更、彻底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生于匈牙利、美国颇具影响力的金融大亨、慈善家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 的反华态度众所周知。2022年1月，索罗斯发推特称“中国领导人是开放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²⁰ 此前，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 (Jamie Dimon) 在2021年11月声称该跨国金融公司会比中国共产党更长寿 (尽管事后他道歉称自己只是在开玩笑)。戴蒙还暗示，中国如试图收复台湾，将遭受沉重的军事打击。他并未对这一威胁言论道歉。²¹ 这种敌对态度的原因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方向未能如华尔街所愿，表现为中国政府强化了资本管制，一系列中国股票从美国退市。在投资集团伯克希尔·哈撒韦2022年的股东大会上，该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 表示中国仍“值得”投资。但即便如此，芒格也接受了其访谈者的预设前提，即将中国政府定性为“侵犯人权”的“集权主义政权”。对芒格而言，只是因为在中国能用更低的价格投资到更好的生意，所以才值得冒额外的风险。

零售消费业。美国零售消费业被中国竞争对手挤压早已不是新闻。2021年3月，耐克等公司以子虚乌有的“强迫劳动”为由抵制新疆棉花。之后不久，耐克发布的广告被指宣扬关于中国人的种族刻板印象，结果是其市场份额进一步下滑，而中国国产品牌安踏早就开始迎头赶上。

此外，中美文化娱乐业出现了明显脱钩，2021年中国电影票房中国产电影占了85%。曾深受中国影迷喜爱的漫威超英电影因意识

形态问题无法进入中国市场，2021年中国票房为0。漫威最近的影片《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中再次出现反华镜头，涉及反政府极右媒体《大纪元时报》，未能在中国上映。美国企业在商业利益（进入中国消费市场）与意识形态上的权衡判断，从这些案例上可见一斑。

美国军工复合体与战争驱动力

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在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促进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战略部门合作方面扮演了独特作用。2021年，世界六大军事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雷神技术、贝宜系统、诺斯罗普·格鲁曼、通用动力对美国政府的销售额总计超过1280亿美元。²² 亚马逊、微软、谷歌、甲骨文、IBM以及极端分子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创办的帕兰提尔等等科技巨头与美国军方形成了紧密联系，近几十年来获得了几千份合同，总值高达数百亿美元。²³ 科技行业在美国庞大情报帝国的数据搜集中扮演了战略角色，在美国媒体和社交媒体的软实力霸权中占据核心地位，确保对全球南方大众进行数字统治。正因为这样，它不会受到真正的监管，也没有被取消垄断的风险。

美国对军事绝对优势的追求导致了在武器、计算机技术（特别是硅芯片）、先进通信（包括卫星网络战）、生物技术等领域的疯狂支出。美国政府2023财年预算的正式军事开支将达813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在整体预算中伪装成其他部门开支的军事开支），五角大

楼声称其未来10年至少需要7万亿美元拨款。²⁴

40年来，新自由主义下的国家私有化导致了美国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国家机构成为两党众参议员、政策与安全顾问、内阁官员、上校、将军乃至总统等政府高官利用其政治内情人身份结交私人利益团体从而发财致富的通道。²⁵ 在政府官僚体系中，所谓“国家安全”的托辞为个人和企业的贪欲乃至激进的军事扩张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种盛行的“第一世界”合法贪腐形式下，企业竞相收买离开公职的官员。这些“合法”贿赂本质上是官员在职时为其提供服务应获的酬劳。比如，前公职人员离职后往往被他们在任期间代为美言、给予有利投票甚至提供政府合约的公司聘为带薪雇员、董事或顾问。²⁶ 这一普遍现象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如下：

- 比尔·克林顿声称，他在2001年离开白宫时曾负债1600万美元，但到2021年，他的身价估计高达8000万美元。²⁷

- 在奥巴马政府领导国务院期间，希拉里与154名来自私人利益集团的人士进行过面谈或通话，其中有85人向克林顿基金会捐款总计1.56亿美元竟未得到追究。²⁸

- 退役四星上将、特朗普政府国防部长、新美国安全中心前董事、绰号“疯狗”的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d Dog” Mattis）2018年获得700万美元的净值。这是他“退役”五年间通过一大批军事承包商的丰厚报酬积累的，其中既有重要国防承包商通用动力公司价值60万至125万美元的股票和期权。²⁹

• 拜登政府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 (Lloyd Austin) 曾在联合技术、雷神技术等军工企业担任董事。他的700万美元净值是作为四星上将“退役”后赚到的。³⁰

2009至2011年，超过70%的美国顶级将军在退役后为军事承包商工作。将军们还可以同时从五角大楼获得经费，从私人军事承包商收取报酬，赚取双重利益。³¹ 仅在2016年，通过政府与私人军事承包商之间旋转门的军官就包括25名将军、9名海军上将、43名陆军中将与23名海军中将。³²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转向了私人部门，为那些世界级大公司担任咨询顾问，在拜登上台后又重返白宫。这次旋转门令人瞠目结舌的体现是，拜登政府任命的高官中至少15名来自WestExec咨询公司。该公司由一群前奥巴马政府官员于2017年创办，宣称为其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地缘政治风险分析”（比如“在战略竞争年代管理中国相关风险”）。³³ 该公司促进科技巨头与美国军方的合作，客户包括波音、帕兰提尔、谷歌、脸书、优步、AT&T、无人机监控公司Shield AI以及以色列人工智能公司Windward等。在拜登政府任职的前WestExec雇员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情报总监艾薇儿·海恩斯 (Avril Haines)、中情局副局长大卫·科恩 (David Cohen)、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伊利·拉特纳 (Ely Ratner) 以及前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 (Jen Psaki) 等人。³⁴

曾在WestExec咨询公司任职的 美国拜登政府官员



政策的形成过程(图源:《谁在统治美国?》,作者威廉·多姆霍夫William Domhoff)³⁵

美国国内战争抵抗力量的衰弱

1973年，美国取消了义务兵役制，之后美军巧妙地、误导性地自称为全志愿军队。此举是为了缓解国内反对美国海外战争的声

势，特别是强烈反对美国对越侵略战争的有产、中产家庭的子女。虽说这项措施名义上的理由是挑选更专业、更敬业的士兵，但其实资产阶级企图利用贫穷劳工家庭的经济弱势，通过提供技术培训和稳定收入诱使他们入伍。美国在战争上的科技进步使其既提升了在被侵略国家杀害平民和敌方士兵的能力，又减少了美国士兵的死亡率。比如，2001到2021年，在耗资2.2万亿美元的阿富汗战争中，241000人（包括71000名平民）死亡，其中美方人员死亡人数仅为2442人，占1%。³⁵ 美方死亡人数减少，弱化了国人对美国战争行动的情感联系，而私人军事承包商的兴起进一步使这种情感变得迟钝。到2010年代中期，据估计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国部队近一半人是私人军事承包商雇佣兵。³⁶ 2016年，世界最大私人军事承包商阿卡德米[原为埃里克·普林斯 (Erik Prince) 创办的黑水公司]被世界最大私募公司阿波罗以约10亿美元收购。³⁷ 如今的美军远不是全志愿军，更恰当的描述应该是全雇佣军。

美国进一步肆意兜售战争的原因在于，虽然它针对100多个国家进行了侵略或参与军事行动，但它从来没有遭到过外国政府的侵略，没有遭受过大规模平民伤亡。助长“美国例外论”的心理根源在于，当代政治精英大多成长于冷战结束后所谓“历史终结”期，他们的国家似乎是战无不胜的。直到中国崛起前，美国在国内外都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因此，这些精英的世界观特别缺乏历史意识，妄自尊大以至于肆无忌惮，这两者结合是极其危险的。

由将军、政客、科技公司、私人军事承包商组成的军工复合体

企图大肆扩展美国的军事能力。如今，华盛顿几乎众口一致地以中俄两国为其军事扩张的借口。与此同时，这一集团中许多人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犯下或支持了战争罪行。

美国很少有重要的资本家个人愿意公开反对妖魔化中国的大合唱，反对者都受到规训或排斥。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中很少看到公开反对或呼吁克制的意见。迈克尔·布隆伯格 (Michael Bloomberg) 在2020年总统选举活动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注意倾听民意，并拒绝将中国领导人称为独裁者，于是被强烈抨击对中国态度“软弱”。布隆伯格似乎已被成功规训，在拜登政府下也加入了好战俱乐部，在2022年2月被任命为五角大楼国防创新委员会 (Defense Innovation Board) 主席。全球管理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主张与中国增进经济往来，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被《纽约时报》诋毁为“帮助提高全球专制腐败政府的地位”³⁸，结果麦肯锡在美国商界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虽然仍有一小部分人继续对中美关系表示乐观，比如富豪投资人、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里奥 (Ray Dalio)，但他们都是局外人。

更关键的是，现在的美国资产阶级上层精英已经将投资分散在一系列产业中，从而得以克服单一产业的短期经济利益局限，与美国战略“大局”一致。与过去专注单一产业的百万富豪相比，今日的亿万富翁已形成更广泛的共识，能够认识到在颠覆中国政权后完全自由化的中国市场将给他们带来重大长期收益。因而，这些亿万富翁更有动力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甘愿承受因此带来的短期损失。

如上所述，美国大资产阶级通过非营利基金会资助了众多智库和政策团体，影响着美国政策的讨论和提议。

在中产阶级上层精英中，有一小部分以CATO研究所为代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极右自由主义孤立主义者。这一政治团体大声反对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和美国的军事扩张，反对美国在乌克兰的作用。但在美国外交政策平台上，他们是被边缘化的，没有太多影响力。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向来是一个“战友团”。这个团伙维持着一个现代国家，雇佣了一大批固定的武装人员、情报人员、间谍。2015年，美国430万人持有获取政府“秘密”“机密”“绝密”资料的安全许可。³⁹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这一国家机器最终都能掌控局面，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特朗普无法实施自己的外交政策，从中可见一斑。

极右翼的崛起和美国政治体制中的虚假制衡机制

资产阶级统治精英和中产阶级对中国的敌意有很深的种族主义根源。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民粹主义与白人至上右翼运动实现联合，称“另类右翼”（Alt Right）。该运动的宣传旗手斯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曾是白人至上主义网站布莱巴特新闻网董事长，同时毫不奇怪，他也是美国最积极的鼓吹反华分子之一。另类右翼的支持基础来自下中产阶级，该群体大多是白人，家庭年收入约7.5万美元。虽然班农甚至特朗普本人喜欢吹嘘自己得到了“白人

工人阶级”中的支持，但其支持基础其实是下中产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

共和党在选举上得益于这个新法西斯主义投票集团的建立。另类右翼往往追捧大资本家的人格，渴望向上流动，加入精英俱乐部。同时，除了憎恶工人阶级，该集团也对精英主义政治和文化领袖表现出仇视，认为这些人阻碍了他们的发财致富之路。1951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 (C. Wright Mills) 指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特征：

他们是一群后卫。短期内，他们会惶恐不安地追求声望；但从长远看来，他们会追逐权力，因为说到底，声望是由权力决定的。与此同时，在政治市场上……新中产阶级正在高声叫卖自己；任何看上去足够体面、足够强大的人都可能占有他们。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认真出个价。⁴⁰

特朗普政府将下中产阶级对其经济状况恶化的怨恨引向了中国。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经济从未完全恢复，宽松的货币政策让大资本家大赚特赚，却令工人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大受损害。下中产阶级对其现状既愤怒又沮丧，亟需一个代言人，因而被特朗普动员起来成为他的重要票仓，其推手就是白人至上主义、种族资本主义以及全面打压中国的新冷战策略。

目前，对中国的敌视情绪在美国民众中广为蔓延，主流媒体和互联网平台则不断强化“中国是自由世界的邪恶敌人，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的印象，反对这一危险趋势的人士言论自由越来越受

到限制。任何认可中俄立场、批评美国对中俄外交政策的声音都会受到大众的强烈抨击。美国的舆论环境越来越像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时期，甚至在某些方面，美国的社会氛围与1930年代初的德国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外人经常误解了美国政治体制中所谓制衡机制和三权分立的真实性质。与欧洲社会革命运动催生宪制改革历史不同，最初由一批产业主(包括奴隶主)奠基的美国宪法一开始就旨在保护私人财产拥有者的权利，防止“暴民多数派”统治。直到今天，美国宪法仍为解除大多数资产阶级传统社会法律权利留有空间。

采取选举人团之类的措施最初是为了保护南方蓄奴州和其他较小的农业州的利益，旨在阻止人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总统。这一非民主的制度因宪法修改流程繁琐困难而得到保护，因而小布什和特朗普虽然实际获得的票数少于各自对手但还是赢得了总统选举。尽管选举权最终扩大到黑人、妇女、无财产者等，但剥夺选民权利的情况仍然存在。2021年，有19个州颁布了34项压制选民的定律，可能限制这些州内多达5500万选民的投票权。⁴¹ 同时，最高法院有权推翻选举权立法、取消平权行动、允许宗教组织削弱公民权利。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被称为“公民联合”(Citizens United) 的裁决取消了对私人和企业选举捐款额度的限制，选举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一场财力的较量。⁴² 在2020年的选举中，总统和参众两院选举的总支出为140亿美元。⁴³ 除了财力较量，还有技术和

心理的较量：基于社交媒体、行为经济学、大数据的技术手段无孔不入，在左右选举进程上起了重大作用。同时，这些技术手段极其昂贵，确保政治几乎是富人专属的游戏。2015年，美国参议员的财富中位数超过300万美元。⁴⁴ 很难说这是一个受到人民制衡的政府。

战争阴霾还会散去吗？

2014年，已经成为中国领导人的习近平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⁴⁵ 而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却拒绝了这一外交橄榄枝，在一个私下演讲中夸耀说美国将太平洋称为“美国领海”，扬言要“以导弹防御包围中国”。⁴⁶ 2020年，英国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 预测中国将在2028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时间点成了美国精英眼中的“魔障”。美国近年来的外交政策和舆论都在为一场遏制中国、阻止其超越美国的热战做准备。在乌克兰发生的代理人战争可视为这场热战的前奏。准备开战的思想动员已在美国全面展开，新法西斯主义的车轮已开始转动，一个新的麦卡锡主义时代已经出现。所谓民主政治只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的遮羞布，不会成为战争机器的刹车机制。

美国有1.4亿贫穷劳动者，其中1700万儿童正遭受饥饿，比新冠疫情前多了600万。⁴⁷ 虽然这个阶级一部分人确实在思想上支持美国兜售战争的政策，但这种支持是与他们的利益直接抵触的：将

近万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牺牲了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人权保障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历史上，黑人、女权运动等美国传统进步群体有着强烈的反战斗争精神，马丁·路德·金博士、马尔科姆·X等领袖英勇斗争，在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对美国在东南亚侵略战争的抵抗浪潮。可悲的是，今天这些进步团体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领导人已不愿挑战华盛顿的反华活动，更有甚者，有人成为了支持者。

美国也有一些重要的道义之声在大声疾呼。但必须指出，反对新冷战的少数进步团体因“为新疆种族灭绝辩护”而遭到诋毁。美国的政治体系无情地排斥社会这一部分的呼声。

尽管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北约积极寻求全球军事扩张，世界大多数人并不欢迎他们制造战争的行为。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第11届紧急特别会议，代表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政府对名为“对乌克兰的侵略”的决议草案投下了反对或弃权票。同时，代表全世界85%人口的国家并未支持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⁴⁸ 华盛顿升级和延长战争、强行与中俄脱钩的行动将导致大规模的经济失调，将给美国的统治带来大规模的负面反应。对于美国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强化美元霸权的过激行为，连印度、沙特等国也深感担忧。同样，墨西哥、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瓜地马拉等国总统没有参加2022年6月美国在洛杉矶主办的美洲峰会，因为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等国家被拒之门外。拉丁美洲对美国统治的抵抗正在增长。但应该看到，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实际没有能力约束美国发动战争。除了自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华盛顿拒绝接受

任何约束。

拜登政府正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制造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最大程度地削弱俄罗斯，引发俄罗斯的政权变更⁴⁹。它还偏离了中美三个联合声明的精神，千方百计破坏台海稳定。虽然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它目前尚算庞大的经济已长期处于衰退和危机状态。

正如罗思义在本研究手册中提到的，美国的经济优势正在削弱，或将被中国的雄厚经济实力终结。除此之外，美国及其北约盟友都面临着深层的经济与生态困境。美国推动的战争将使这些问题恶化。战争注定将使欧洲陷入GDP低增长甚至负增长、通货膨胀以及无益于社会发展的军费暴增。美国实际上已放弃了认真应对气候变化的任何借口，更不用说它无休止的战争意图早已加剧了气候灾难。而且讽刺的是，尽管美国国内对经济脱钩存在政治共识，但美国企业仍在增加中国订单，实质性脱钩仍然是一个白日梦。

但是美国不会自己在经济上倒下，华盛顿推动战争、制裁、经济脱钩的后果将继续损害其自身经济，并危及世界粮食供应链。由此产生的全球社会动荡将反过来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对其统治产生更多挑战，包括越来越大的反对美元霸权声势。

中国相对稳定的社会治理、强大的国防实力、和平的外交政策以及对美国强权的抵制使得它，如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所说，能“从实力的地位出发”，最终迫使美国放弃与中国开战并获胜的幻想。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主权国家，继续倡导人类

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等全球治理新方案，这符合全球南方的利益。应当立即致力于重振金砖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等可行的全球南方多边计划。在这些计划里，世界大多数人拥有共同利益。全世界人民绝大多数来自南方国家，他们必须抵制战争、呼吁和平。美国不会是第一个因狂妄自大而过度膨胀的帝国，其霸权最终也将走向穷途末路。

备注 \\\\\\\\\\\\\\\\\\\

1. 本文原针对中国读者而作，经修改发表于中国新闻网站“观察者网”。
2. Meet the Press, “War Game: What Would a Battle for Taiwan Look Like?”, ” NBC News, May 15, 2022, <https://www.nbcnews.com/meet-the-press/video/war-game-what-would-a-battle-for-taiwan-look-like-140042309777>.
3.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 Supporters, ”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www.cnas.org/support-cnas/cnas-supporters>.
4. Roxana Tiron, “U.S. Sees Rising Risk in ‘Breathtaking’ China Nuclear Expansion, ” Bloomberg, April 4,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04/u-s-sees-rising-risk-in-breathtaking-china-nuclear-expansion>.
5.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2/6/pdf/290622-strategic-concept.pdf.
6. Niall Ferguson, 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5).
7. Joan E. Greve, “Biden’s Record Defense Budget Draws Progressive Ire Over Spending Priorities, ” The Guardian, April 3,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apr/03/biden-record-defense-budget-progressive-spending-priorities>; Alicia Parlapiano, Deborah B. Solomon, Madeleine Ngo and Stacy Cowley, “Where \$5 Trillion in Pandemic Stimulus Money Went, ”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22,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2/03/11/us/how-covid-stimulus-money-was-spent.html>.
8. Swiss Policy Research, “The American Empire and Its Media, ” March 2022, <https://swprs.org/the-american-empire-and-its-media/>; Laurence H. Shoup, Wall Street’s Think Tan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Empire of Neoliberal Geopolitics, 1976-201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9); Richard

Harwood, “Ruling Class Journalists, ”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30, 199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1993/10/30/ruling-class-journalists/761e7bf8-025d-474e-81cb-92dcf271571e/>.

9.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American Empire, Not ‘If’but ‘What Kind’, ”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5/10/arts/american-empire-not-if-but-what-kind.html>.

10.John Bellamy Foste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Tragedy and Farc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7).

11.Antony J. Blinken and Robert Kagan, ‘America First’Is Only Making the World Worse. Here’s a Better Approach, ”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4, 2019,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9/01/04/america-first-is-only-making-the-world-worse-heres-a-better-approach/>.

12.Victoria Nuland, “Remarks at the U.S.-Ukraine Foundation Conference, ”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3, 2013, <https://2009-2017.state.gov/p/eur/rls/rm/2013/dec/218804.htm>.

13.Matthew Kroenig, “Washington Must Prepare for War with Both Russia and China, ”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2/18/us-russia-china-war-nato-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

14.Seth Cropsey, “The U.S. Should Show It Can Win a Nuclear War, ”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7,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us-show-it-can-win-a-nuclear-war-russia-putin-ukraine-nato-sarmat-missile-testing-warning-11651067733>;
“A Conversation with Representative Michael McCaul,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pril 6, 2022, <https://www.cfr.org/event/conversation-representative-michael-mccaul>; Elliot Abrams, “The Ukraine War, China, and Taiwan, ”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3, 2022, <https://www.cfr.org/blog/ukraine-war-china-and-taiwan>.

15.John Smith, “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 Monthly

Review 64, no. 3 (July-August 2012), <https://doi.org/10.14452/MR-064-03-2012-07>;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Phone Workers Today Are 25 Times More Exploited Than Textile Workers in 19th Century England: The Thirty-Ninth Newsletter (2019), ” September 25, 2019, <https://thetricontinental.org/newsletterissue/iphone-workers-today-are-25-times-more-exploited-than-textile-workers-in-19th-century-england-the-thirty-ninth-newsletter-2019/>.

16.Felix Richter, “China Is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Superpower, ” Statista, May 4, 2021,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20858/top-10-countries-by-share-of-global-manufacturing-output/>.

17. “10 US Companies with Highest Revenue Exposure to China, ” Yahoo! Finance,

a)August 2, 2020,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10-us-companies-highest-revenue-225350456.html>.

18.Yardeni Research, Inc., S&P 500 Revenues & the Economy, June 13, 2022, <https://www.yardeni.com/pub/stmktbriefrev.pdf>;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S.-China Trade Facts, ”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ustr.gov/countries-regions/china-mongolia-taiwan/peoples-republic-china>.

19.Phil Hall, “Can Marvel Films Profit without Playing in China? Here’s What Disney CEO Bob Chapek Says, ” Benzinga, May 12, 2022, <https://www.benzinga.com/general/entertainment/22/05/27166040/disneys-chapek-marvel-films-can-profit-without-playing-in-china>.

20.George Soros (@georgesoros), “China’s Xi Jinping is the greatest threat that open societies face today, ” Twitter, January 31, 2022, <https://twitter.com/georgesoros/status/1488233860584427530?lang=en>.

21.David Henry and Anshuman Daga, “Jamie Dimon jokes that JPMorgan will outlast China’s Communist Party, ” Reuters, November 23 2021, <https://www.reuters>.

com/business/jpmorgan-ceo-dimon-jokes-his-bank-will-outlast-chinas-communist-party-2021-11-23/

22.Bloomberg Government, “The Top 10 Defense Contractors, ” June 10, 2021, [https:// about.bgov.com/top-defense-contractors/](https://about.bgov.com/top-defense-contractors/).

23.Big Tech Sells War,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bigtechsellswar.com/>; April Glaser, “Thousands of Contracts Highlight Quiet Ties Between Big Tech and U.S. Military, ” NBC News, July 8, 2020, <https://www.nbcnews.com/tech/tech-news/thousands-contracts-highlight-quiet-tyes-between-big-tech-u-s-n1233171>; Joseph Nograles, “Buy PLTR Stock: Palantir Is a Defense Contractor Powerhouse, ” Nasdaq, October 14, 2021, <https://www.nasdaq.com/articles/buy-pltr-stock%3A-palantir-is-a-defense-contractor-powerhouse-2021-10-14>; Frank Konkel, “NSA Awards Secret \$10 Billion Contract to Amazon, ” Nextgov, August 10, 2021, <https://www.nextgov.com/it-modernization/2021/08/nsa-awards-secret-10-billion-contract-amazon/184390/>.

24.Mike Stone, “Biden Wants \$813 Billion for Defense as Ukraine Crisis Raises Alarm, ” Reuters, March 28, 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s/biden-wants-813-billion-defense-ukraine-crisis-raises-alarm-2022-03-28/>; Michael A. Cohen, “Bloated Defense Budget Passes Easily but Congress Fights over Safety Net Programs, ” MSNBC, October 1, 2021, <https://www.msnbc.com/opinion/bloated-defense-budget-passes-easily-congress-fights-over-safety-net-n1280568>.

25.Open Secrets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www.opensecrets.org/>.

26.Ben Freeman, “The Hidden Costs of Star Creep: Generals Making More in Retirement Than in Service, ” POGO: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February 8, 2012, <https://www.pogo.org/analysis/2012/02/hidden-costs-of-star-creep-generals-making-more-in-retirement-than-in-service>.

27.Sam DiSalvo, “How Much Is Bill Clinton Worth?” Yahoo! News, February 12, 2021, <https://ca.news.yahoo.com/much-bill-clinton-worth-234218086.html>.

28.CNBC, “Many Who Met with Clinton as Secretary of State Donated to Foundation, ” August 23, 2016, <https://www.cnn.com/2016/08/23/most-of-those-who-met-with-clinton-as-secretary-of-state-donated-to-foundation.html>.

29.Jeremy Herb and Connor O’Brien, “Pentagon Pick Mattis Discloses Defense Industry Work, ” Politico, January 8, 2017, <https://www.politico.com/blogs/donald-trump-administration/2017/01/james-mattis-defense-disclosures-233331>.

30.Dan Alexander, “Here’s How Much Secretary of Defense Lloyd Austin Is Worth, ” Forbes, June 18, 2021,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nalexander/2021/06/18/heres-how-much-secretary-of-defense-lloyd-austin-is-worth/?sh=552340be63e4>.

31.Luke Johnson, “Report: 70 Percent of Retired Generals Took Jobs with Defense Contractors or Consultants, ” HuffPost, November 20, 2012,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defense-contractors-generals_n_2160771

32.Tom Vanden Brook, Ken Dilanian and Ray Locker, “How Some Retired Military Officers Became Well-Paid Consultants, ” ABC News, November 18, 2009, <https://abcnews.go.com/Politics/retired-military-officers-retire-paid-consultants/story?id=9115368>; Mandy Smithberger, “Brass Parachutes: The Problem of the Pentagon Revolving Door, ” POGO: Project on Government Oversight, November 5, 2018, <https://www.pogo.org/report/2018/11/brass-parachutes>.

33.Jonathan Guyer and Ryan Grim, “Meet the Consulting Firm That’s Staff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The Intercept, July 6,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7/06/westexec-biden-administration/>; WestExec Advisors, accessed August 14, 2022, <https://www.westexec.com/>.

34.Jonathan Guyer and Ryan Grim, “Meet the Consulting Firm That’s Staff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The Intercept, July 6, 2021,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7/06/westexec-biden-administration/>; Alex Thompson and Theodoric Meyer, “Janet Yellen Made Millions in Wall Street, Corporate Speeches, ”

Politico, January 1, 2021,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1/01/01/yellen-made-millions-in-wall-street-speeches-453223>; Eric Lipton and Kennet P. Vogel, “Biden Aides’ Ties to Consulting and Investment Firms Pose Ethics Test, ”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8,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28/us/politics/biden-westexec.html>.

35.Neta C. Crawford and Catherine Lutz, “Human and Budgetary Costs to Date of the U.S. War in Afghanistan, ” Costs of War Project, April 15, 2021,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figures/2021/Human%20and%20Budgetary%20Costs%20of%20Afghan%20War%2C%202001-2021.pdf>.

36.Bryan Stinchfield, “The Creeping Privatization of America’s Armed Forces, ” Newsweek, May 28, 2017, <https://www.newsweek.com/creeping-privatization-americas-forces-616347>.

37.Ross Wilkers, “Apollo Group, Constellis Executives to Buy Out Security Services Contractor, ” GovCon Wire, August 15, 2016, <https://www.govconwire.com/2016/08/apollo-group-constellis-executives-to-buy-out-security-services-contractor/>.

38.Walt Bogdanich and Michael Forsythe, “How McKinsey Has Helped Raise the Stature of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5,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12/15/world/asia/mckinsey-china-russia.html>.

39.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Security Clearance Process: Answers to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 October 17, 2016,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3216>.

40. C.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353.

41.Tony Eskridge and Shailly Gupta Barnes, “Quick Facts on Voting Rights, ” Kairos Center, accessed August 9, 2022, <https://kairoscenter.org/quick-facts-on-voting-rights/>.

42. Ian Vandewalker, "Since Citizens United, a Decade of Super PACs, " The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January 14, 2020, <https://www.brennancenter.org/our-work/analysis-opinion/citizens-united-decade-super-pacs>.
43. Brian Schwartz, "Total 2020 Election Spending to Hit Nearly \$14 Billion, More than Double 2016's Sum, " CNBC, October 28,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0/28/2020-election-spending-to-hit-nearly-14-billion-a-record.html>.
44. Dan Kopf, "The Typical US Congress Member Is 12 Times Richer than the Typical American Household, " Quartz, February 12, 2018, <https://qz.com/1190595/the-typical-us-congress-member-is-12-times-richer-than-the-typical-american-household/>.
45. Embass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Xi Jinping Holds Talks with President Barack Obama of the US, " November 12, 2014, http://us.china-embassy.gov.cn/eng/zmgx/zxxx/201411/t20141115_4909273.htm.
46. William Gallo, "Clinton Says US Would 'Ring China With Missile Defense', " Voice of America, October 14, 2016, <https://www.voanews.com/a/clinton-says-us-would-ring-china-with-missile-defense/3550418.html>.
47. Shailly Gupta Barnes, "Explaining the 140 Million: Breaking Down the Numbers Behind the Moral Budget, " Kairos Center, June 26, 2019, <https://kairoscenter.org/explaining-the-140-million/>; Save the Children, "Child Hunger in America, " 2021, <https://www.savethechildren.org/us/charity-stories/child-hunger-in-america>.
48. No Cold War, "Briefing: The World Does Not Want a Global NATO, " July 28, 2022, <https://nocoldwar.org/news/briefing-the-world-does-not-want-a-global-nato>.
49. "China Says U.S. Cannot Speak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BC News, March 19, 2021, <https://www.bbc.com/news/av/world-56456021>.

21世纪生态和平运动 之“灭绝主义笔记”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1980年，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作者、欧洲核裁军运动领军人物E.P.汤普森（E. P. Thompson）撰写了开山之作《关于文明末期之灭绝主义笔记》。（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¹尽管自那以后世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但汤普森的文章仍是一个出发点，有助于探讨当今时代核心矛盾，主要有地球生态危机、新冠疫情、新冷战以及现任“混沌帝国”，这些问题的深层根源都来自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²

对于汤普森来说，“灭绝主义”一词不是指生命本身的灭绝，因为即使面临全球热核交锋，一些生命仍会存续下去。他指的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当代）文明灭绝”趋势。无论如何，灭绝主义指的是大规模的消亡，其内涵可以解释为“社会经济、政体、意识形态中各种表现程度不一的特征将社会推向一个必将导致群体灭绝的方向。”³ 这篇文章发表八年后的1988年，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才向美国国会作了著名的全球变暖证词；同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成立。因此，汤普森对灭绝主义的探讨仅限于核战争，没有直接谈及当代社会另一个新的灭绝倾向：地球生态危机。然而，他的观点具有深刻的社会生态学意义，现代社会的灭绝倾向因而被视为直接违背了“人类生存的必要生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建设社会平等、生态绵延的环境而斗争⁴。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二战以来一直笼罩地球的核威胁似乎已经消退。因此，汤普森灭绝主义理论的后续研究大都以本身也是“群体灭绝”一大来源的地球生态危机为背景进行讨论。⁵ 然而，最近十年来，新冷战发生，核浩劫的威胁重新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4年美国策划的独立广场政变以及此后基辅当局与顿巴斯俄语区分离共和国之间的乌克兰内战，现在已经演变为俄乌之间的全面战争。2022年2月27日，俄方在乌克兰的军事进攻第三天时，事态显现出危险的全球意义：俄方将其核力量设为高度警戒状态，以警告北约不要直接干预战争，无论是以无核或有核形式。⁶ 现在世界核大国之间爆发全球热核战争的危险比冷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大。

因此有必要应对双重灭绝倾向：地球生态危机（不仅包括气候变化，还有科学家确定的地球作为人类安全家园八大重要界限正在被突破）、日益严重的全球核毁灭威胁。研究两种全球生存威胁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注意修改过去对核灭绝动因的理解，因为它在美国几十年的单极霸权下发生了质变，世界的关注点也转向了其他

地方。冷战结束已有30年，当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风险迫在眉睫之际，为何全球热核战争的威胁再次笼罩全球？和平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要采取哪些方法来应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全球生存威胁？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研究核冬天之争、反制武力理论、美国谋求全球核霸权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当今“灾难资本主义”（catastrophe capitalism）造成的全球生存威胁。

核冬天

1983年，美苏两国的大气科学家团队在主要科学期刊上发表了核战争导致“核冬天”的预测模型。当时正值里根政府核扩张，并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星球大战计划”），核末日威胁日益加剧的时候。人们发现，全球热核交锋将导致100多个城市陷入汪洋火海，烟尘在大气中弥漫，阻挡太阳辐射，从而使地球平均气温大幅下降。气候将往与全球变暖相反的方向急剧变化，全球迅速变冷，全球（至少整个半球）气温在一个月内下降几度甚至“几十度”，对地球生命造成可怕后果。因此，尽管全球热核交锋的直接后果将导致数亿甚至超过十亿人死亡，但其间接后果将严重得多，哪怕逃过了核弹的直接打击，大多数人也会饿死。核冬天假说对当时的核军备竞赛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促使美苏两国政府悬崖勒马。⁷然而，美国的权力精英将核冬天模型视为对核军备工业和五角大楼的直接攻击，尤其是针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这就引发了史上最大的科学争论之一，

只不过这次争论更关乎政治而非科学，因为科学结果从未被真正质疑。尽管有人说美国宇航局科学家的初始核冬天模型过于简单，后来也有人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后果没有最初设想的那么极端：比起“核冬天”，“核秋天”更为恰当；但是科学模型一再验证了核冬天假说。⁸尽管如此，如果说公众和政治领袖对核冬天研究的最初反应有力地推动了解除核武器运动，促进了核军备控制和冷战结束，但它很快就遭到了美国核战争机器背后强大军事、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反攻。因此，主流媒体联合各种政治势力，发起了种种诋毁核冬天假说的宣传攻势。⁹ 2000年，著名科学杂志《发现》竟把核冬天假说列入“过去20年20大科学谬误”名单。不过，《发现》杂志对此提出的理由最多只是，198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核冬天研究背后的关键科学家到1990年时有所退却，认为全球核交锋导致的平均温度下降幅度估计比最初设想的要小一些，最多导致北半球平均温度下降20摄氏度。然而，这一最新估算对于整个地球来说仍是毁灭性的。在这个科学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否定论案例（甚至比否定气候变化还严重）中，公共领域和军方普遍不接受核冬天的科学发现，理由竟然是最初的估算有些“夸大”。几十年来，直到现在，统治圈一直利用“夸大”的指控来淡化核战争的全部影响。就五角大楼资本主义（Pentagon capitalism）而言，这种否定论的动机显然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允许核冬天的科学结果成立，那么以打一场“打得赢”或者至少己方“占上风”的核战争为目标的战略计划将毫无意义。一旦考虑到大气环境的影响，这就是全球性的

破坏，而不仅局限在特定的核战区。全球热核交锋后几年内，难以想象的后果将毁灭地球上绝大多数人，这甚至超出了“相互保证毁灭” (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机制所设想的结果¹⁰。

在某些方面，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一直被核战略规划者轻描淡写。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在《末日机器》 (The Doomsday Machine) 中指出，美国战略分析师估算的全面核战死亡人数从一开始，“甚至在尚未发现核冬天之前”就是一种“极大低估”，因为他们有意忽略了由核爆炸引发的城市火焰风暴（这是对城市总体人口的最大影响），依据是破坏程度太难估计这种站不住脚的理由。¹¹ 埃尔斯伯格写道：

然而，人们在60年代就知道，由热核武器引发的火焰风暴一定是核战争中造成最大人员死亡的因素……此外，（直到古巴导弹危机约21年后第一批核冬天研究成果问世前）没有人会认识到……我们策划的先发制人核打击 (first strike) 的间接影响将严重危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类。这些影响来自我们攻击城市的另一被忽视的后果：烟雾。实际上，参谋长 (联席会议) 和他们的策划专家无视了火与烟相生相伴的事实。但危及生存的不是普通火灾甚至重大火灾产生的烟雾，留在大气低层的烟雾很快会被降雨驱散。但我们的核武器在目标城市所必然引发火焰风暴将把烟雾送入大气上层。

多重火焰风暴导致的强烈上升气流将数百万吨烟尘送入平流层，这里烟尘无法被降雨冲刷干净，而是迅速包围地球，形成厚厚一层，阻隔地球上的大部分阳光，这种情况将持续十年以上。光照

减少，全球范围内气温大幅下降，导致所有农作物颗粒无收，人类及其他以植物为生的动物将几乎全部饿死。受到核爆炸及余波直接影响的欧亚（这是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预见的直接后果）、非洲、北美的人口几乎全部灭亡，而逃过直接影响南半球的人口也将几乎全部饿死。¹²

埃尔斯伯格在2017年写道，比最初反对核冬天假说更糟糕的是，在随后几十年里，美俄两国的核政策制定者“仍旧保留在城市附近实施数百次核爆的‘选项’，而核爆足以把大量烟尘送进平流层上层，（由此导致的核冬天，）使地球上几乎所有人饿死，我们自己终究也难逃一劫。”¹³灭绝主义推动力、深植于五角大楼资本主义的“末日机器”（doomsday machine）所构建的否定论更加重要，因为，不但最初的核冬天研究从未被推翻，而且依据比1980年代早期模型更精准的电脑模型，21世纪的核冬天研究进一步表明，比最初模型假设强度更低的核交锋也可能引发核冬天。¹⁴ 这些新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发现》杂志上得到了体现。2007年，在把核冬天假说列入前20年“20大科学谬误”仅仅七年之后，《发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题为《核冬天回归》（The Return of Nuclear Winter）的文章，根本上否定了之前的文章。¹⁵

最新研究（某种程度上受到核扩散的推动）表明，假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核战争，引爆100颗1.5万吨当量（广岛原子弹等级）的原子弹，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与二战死亡总人数相当，从长期看还要加上全球性饥荒所造成的死亡和苦难。原子弹爆炸将直

接引发八到十平方公里的火焰风暴，燃烧的城市将向平流层释放约500万吨烟尘，在两周内将整个地球包围起来。烟尘无法被降雨洗刷，可存留10年以上。烟尘遮挡光照，使全球粮食产量减少20%至40%。位于平流层的烟尘层吸收不断升温的阳光，温度上升到接近水的沸点，导致人口稠密地区的臭氧层减少20%至50%，并造成史无前例的紫外线强度上升，皮肤白皙者约六分钟即可被严重晒伤，皮肤癌罹患率创历史新高。同时，死于饥荒的人数可达20亿。¹⁶

从2007年至今仍在持续进行、发表于主要同行评议科学期刊上的一系列核冬天新研究并未止步于此。它们还研究了美、俄、中、法、英等五个核大国参与全球热核交锋将导致的后果。美俄两国占据了世界核武库的大部分，拥有数千枚威力相当于广岛原子弹7-80倍的战略核武器（然而还有一些1950和60年代制造但之后已停产的热核武器威力相当于原子弹的1000倍）。仅需一枚战略核武器击中城市，就能让方圆233到394平方公里的土地陷入汪洋火海。据科学家测算，一场全球全面热核交锋所引发的大火将向平流层释放1.5-1.8亿吨黑碳烟尘。烟尘将滞留20至30年，可阻挡北半球70%、南半球35%的光照。正午的太阳仿佛午夜的一轮冷月。全球日均气温在一到两年间都在冰点以下，北半球主要农业区将持续更久。平均气温低于末次冰期的气温。农业区的生长季节将消失10年以上，降雨量减少可达90%。大多数人将死于饥饿。¹⁷

兰德公司物理学家赫尔曼·卡恩 (Herman Kahn) 在其 1960年出版的《论热核战争》(On Thermonuclear War) 一书中提出了“末日

机器”概念，即在核战争爆发时让地球人全部灭亡的机器。¹⁸ 卡恩并不是主张建立末日机器，也不认为美苏已经建立或正在尝试建立末日机器。他只是表示，建立确保核战中无人幸存的机制是实现各方全方位不可逆威慑、去除核战可能的一种廉价替代方案。埃尔斯伯格原本也是核战略专家，他的评价与参加核冬天模型研发的科学家卡尔·萨根 (Carl Sagan)、理查德·图尔科 (Richard Turco) 等人不谋而合：几个核大国如今掌握的战略核武器如被引爆，即构成实际上的末日机器。末日机器一旦运转，几乎肯定将直接或间接导致大部分地球人口灭亡。¹⁹

反制武力与美国的核优势野心

从苏联取得对美国大致核均势的1960年代开始直到苏联解体，美苏冷战期间的主导核战略是基于“相互确保毁灭”原则。该原则指的是双方彻底毁灭的可能性，比如数亿人死亡，实际上等于核均势。然而，核冬天研究表明，全面核战争的后果将远远超出此范围，将导致几乎全部地球人类以及其余大多数物种的灭亡。尽管如此，美国仍无视核冬天的警示，企图凭借比苏联强得多的实力突破“相互确保毁灭”红线，向获取“核优势”的方向发展，以恢复美国在冷战初期的核优先水平。核优势与核均势相反，意味着“取消报复性核反击的可能性”，因此也被称为“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²⁰。因此，华盛顿官方国防立场始终保留美国对有核或无核国家采取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可能性，这就事关重大了。

除了提出末日机器概念，作为美国知名战略规划专家的卡恩还发明了打击价值 (countervalue) 和反制武力 (counterforce) ²¹这两个重要术语。“打击价值”是指以敌方的城市、平民、经济为打击目标，目的是彻底消灭，导致“相互确保毁灭”。相反，反制武力是以敌方核武器设施为打击目标，防止核报复。

当肯尼迪政府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 最初提出反制武力战略时，它被视为一种“不攻击城市”战略，即打击对手核武器而非平民，此后常被以此理由被错误地合理化。然而，麦克纳马拉很快意识到反制武力战略的缺陷：它引发了以实现或去除核优势为目的的核军备竞赛。此外，反制武力的“抢先”打击不针对城市的说法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因为打击目标也包括城市中的核战指挥中心。因此，他很快放弃了这个方向，转而支持基于“相互确保毁灭”原则的核战略，认为这是实现核威慑的唯一正确方法。²²

美国这一核战略在1960和7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盛行一时，表现在接受与苏联的大致核均势以及接受“相互确保毁灭”的现实可能性。然而，这一战略在卡特政府最后一年瓦解了。1979年，美方迫使北约允许其在欧洲部署了巡航导弹和潘兴II型 (Pershing II) 导弹，两种导弹均为针对苏联核武库的反制武器，这一决定引发了欧洲的反核运动。²³随后，里根领导的美国政府全面采纳了反制武力战略。²⁴里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旨在建立一套足以保卫美国国土的全面反弹道导弹系统。尽管该计划后来因不切实际而

被放弃，它还是催生了后续几届政府的反导系统。²⁵此外，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推动了后被称为“和平卫士”的MX导弹，它被视为一种能够在苏联导弹发射前抢先摧毁之的反制武器。这类武器都有潜力在先发制人核打击中将苏联武装力量“斩首”，并有能力通过反导系统拦截漏网的苏联导弹。²⁶反制武器精准度要求更高，因为它们不再被视作像是“打击价值”攻击中的城市克星，而是要对导弹发射井、机动陆基导弹、核潜艇、指挥控制中心等进行精确瞄准。美国在反制武器方面拥有技术优势。

美国从1979年开始大肆进行核武器扩充，在欧洲策划部署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运载系统，此举引发了1980年代欧美声势浩大的反核战争抗议活动，汤普森的灭绝主义学说和核冬天的科学研究也由此而来。然而，用军备控制协会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珍妮·诺兰 (Janne Nolan) 的话说，如今，以核优势为要旨的“反制武力仍是美国核战略的神圣原则”。²⁷

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华盛顿立即启动将新的单极地位转化为美国永久称霸全球愿景的进程，其开端就是1992年2月时任美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Paul Wolfowitz) 发布的《国防政策指南》 (Defense Policy Guidance)。²⁸其实施方法是通过地缘政治操作将西方主导地区扩张到前苏联部分地区或其势力范围内的地区，以防止俄罗斯作为大国重新崛起。与此同时，在核裁军的气氛中以及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核力量退化，美国企图将其核武器“现代化”，用技术更先进的战略武器取代，目的不是要增

强威慑，而是要获得核优势。²⁹美国在冷战后通过继续推广反制武器追求核优势的做法在当时的核政策辩论中被称为“极多主义” (maximalist) 战略，遭到“极简主义” (minimalist) 战略 (依赖“相互确保毁灭”原则) 派别的反对。最终，极多派获胜，新世界秩序的决定性因素是：北约扩张 (乌克兰被视为最终的地缘政治战略支点)、美国对绝对核主导、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极多主义战略企图。³⁰

2006年，基尔·利伯 (Keir A. Lieber)、达里尔·普雷斯 (Daryl G. Press) 在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的旗舰期刊《外交》 (Foreign Affairs) 上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美国核优势的崛起”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利伯和普雷斯文章中认为，美国“即将获得核优势”，也就是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这是美国至少从冷战结束以来的目标。正如两位作者所说：“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实际上是在故意寻求核优势。”³¹

美国可能获得先发制人核打击能力的底气在于新型核武器以及自冷战后就在加速进行的核武器现代化。配备核弹的巡航导弹、可发射导弹至近岸的核潜艇、同时携带核弹巡航导弹和重力核弹的B-52低空飞行隐形轰炸机等武器装备都可以更有效地突破俄罗斯或中国的防御。更精确的洲际弹道导弹可完全摧毁加固的导弹发射井。更先进的监控系统可跟踪、摧毁机动陆基导弹和核潜艇。与此同时，美国核潜艇上安装了精确度更高的三叉戟II型D-5导弹，它携带了威力更大的核弹头，用于打击加固的发射井。美国领先的遥

感技术大大增强了其侦察机动陆基导弹和核潜艇的能力。锁定其他核大国卫星的能力可以削弱甚至瓦解它们发射核导弹的能力。³²

将战略武器部署在近期加入北约的国家，以及与俄罗斯接壤或靠近的国家，能够提高核武器打击莫斯科等俄罗斯目标的速度，令克里姆林宫猝不及防。美国在波兰和罗马尼亚建立的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设施也是潜在的进攻性武器，能够发射搭载核弹的战斧巡航导弹。³³ 主要用于对美国先发制人核打击进行报复性反击的核导弹防御设施或许有能力击落对手发射的数量有限的“幸存”导弹，但这些反导系统在面对先发打击时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们无力应付数量庞大的导弹和诱饵弹。此外，美国近几十年来研发了大量高精度的非核航空航天武器，可用于针对敌方导弹或指挥控制设施的反制武力打击。基于卫星的精准制导使其反制效力可与核武器媲美。³⁴

根据利伯和普雷斯在2006年的说法：“北京未来十年获得可生存核威慑力量的可能性很小，”而俄罗斯的威慑力量在面临美国大规模先发打击能否生存也是存疑的。“我们的分析意味深远：俄罗斯领导人不能再指望可生存核威慑力量了。”正如他们所说，美国正在“寻求现代军事技术各方面的优势，包括常规武器和核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升级控制”策略。³⁵

美俄两国在2010年签署了《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 Treaty)，虽然限制了核武器数量，但并未阻止以摧毁对方武器为目的的反制武器现代化竞赛。事实上，核武器数量限制使美国原

本就占上风的反制武力战略更加可行，因为报复性核武器的生存三要素之一是这类武器数量庞大，因此具有冗余性（另外两个是陆基导弹场地的坚固性和隐蔽性）。³⁶ 华盛顿设定核优势目标后，美国开始单方面退出冷战期间缔结的一些主要核条约。2002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单方面退出了《反弹道导弹条约》(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2019年，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华盛顿声称俄罗斯违反了《中程核力量条约》(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并退出了该条约。2020年，还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退出了《开放天空条约》(Open Skies Treaty，该条约限制对他国的侦察飞行)；俄罗斯紧接着也于2021年也退出该条约。毫无疑问，退出这些条约对华盛顿有利，为其谋求核优势扩大了反制武力选择。

鉴于美国谋求全面核优势的动作，俄罗斯20年来也在努力对其核武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它的反制能力处于明显弱势。因此俄罗斯的基本核战略取决于它对美国先发核打击的担忧程度，因为这种打击可有效解除其核威慑和报复反击能力。因此，俄罗斯正努力重建可靠的核威慑。哥伦比亚大学萨尔茨曼战争与和平研究所 (Saltzman 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的辛西娅·罗伯茨 (Cynthia Roberts) 2020年在《俄罗斯核威慑政策揭秘》(Revelations About Russia'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一文中写道，俄方感觉到美国对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两方面的战略力量进行提升，这种持续的努力是为了“干扰俄方的核威慑，不给莫斯科有效二次打击 (second strike) 的选项”，通过“斩首有效、彻底地消除其核威慑。”³⁷虽然美国

采取了扬言“首先使用核武器和阶段升级”的极限核“防御”姿态，在升级的各个水平上保持优势地位，但与俄罗斯“威慑失效即全面开战”的策略相比，前者仍主要依赖“互相确认毁灭”机制。³⁸

然而，近年来，中俄两国在战略武器技术和系统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了对抗华盛顿提升先发核打击能力的企图，中和其核威慑，莫斯科和北京都转向了不对称战略武器 (asymmetrical strategic weapons) 系统，旨在抵消美国在导弹防御和高精度目标定位方面的优势。洲际弹道导弹易受攻击是因为，虽然它们达到了高超音速 (hypersonic speed，通常达到5马赫即五倍音速以上)，但当它们再次进入大气层时，会就像子弹一样沿着一条可预测弹道弧线前进。因此它们缺乏突袭能力，其攻击目标是可预测的，理论上它们可以被反弹道导弹拦截。安置洲际弹道导弹的加固发射井就成了明显目标，而且考虑到美国拥有高精度卫星制导的有核、无核导弹，它们现在的风险大增加了。面对这些对两国基本威慑力构成威胁的反制武力，中俄都抢在美国前面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可通过空气动力机动躲避导弹防御系统，防止对手掌握预设的最终目标。俄罗斯研发了名为“匕首” (Kinzhal) 的高超音速导弹，据说自身速度可达10马赫以上；还有“先锋” (Avangard) 高超音速武器，在火箭助推下可达到27马赫的惊人速度。中国研发出“乘波体” (waverider)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速度可达6马赫。有人借用中国俗语称其为“杀手锏”，对抗装备先进得多的对手，这是一种有效武器³⁹。

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一直在研发反卫星“太空反制”武器，旨在消除美国在高精度核武器和非核武器方面的优势。⁴⁰

考虑到其他核大国的技术实力，华盛顿对所谓核优势仍是力有不逮。此外，由反制武力战略引发的核军备竞赛从根本上讲是非理性的，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热核大战，其后果甚至远远大于“互相确认毁灭”情景所设想的后果，可造成双方数亿人死亡。核冬天则意味着，在全球核交锋中，整个地球将被环绕在平流层的烟尘包围，人类将几乎全部灭亡。

考虑到这一因素，美国基于打赢全面核战争想法的核姿态尤其危险，因为它否认了城市中火焰风暴的作用，因而否认了大量烟尘升入大气高层、遮挡大部分阳光的后果。因此，美国的核优势野心，就像“互相确认毁灭”的英文缩写MAD一样，变成了一种疯狂举动。⁴¹ 埃尔斯伯格写道：

希望通过斩首式进攻成功避免双方同归于尽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现实的判断是，美国与从前的苏联、如今的俄罗斯之间若展开核交锋，不但对两国，对全世界都将是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决策者）表现得他们仿佛相信（又或者真的相信）这种威胁的本质并不是随时准备引发一场全球屠杀。⁴²

新冷战与欧洲战场

在《灭绝主义笔记》中，并且作为1980年代欧洲核裁军运动领军人物的基本立场，汤普森认为，当时欧洲的核武器扩张是军事机

器和技术需求的产物，“尽管每次危机或‘敌人’的创新给予它向上的推力，但它的进展仍独立于国际外交局势的潮起潮落。”⁴³ 他的观点是为了促进东西方反对各自当局的和平运动进行联合的一种策略，依据的理由是，核扩张是双方共同导致的结果。然而，在这方面，他掩盖了自己的证据，这些证据指向了华盛顿大肆扩张反制核武器、在欧洲部署对苏战略武器的事实。在1982年9月《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一篇题为《核斗鸡》(Nuclear Chicken)的文章中，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保罗·斯威兹(Paul M. Sweezy)质疑了汤普森的这一观点，不仅指出北约在美国领导下的战略扩张，而且指出美帝国秩序严重依赖于对其他国家(包括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进行先发打击的可靠威胁。⁴⁴

1981年，埃尔斯伯格为汤普森和丹·史密斯(Dan Smith)主编的美国版《抗议与生存》(Protest and Survive)一书作序，列举了一长串有据可查的案例，说明美国自1949年以来就在利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恐吓手段迫使其他国家(包括有核和无核国家)让步，以实现其帝国主义目的。⁴⁵ 仅1945至1996年之间，有据可查的核恐吓就有25次，之后此类事件仍有发生。⁴⁶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核战争进行威胁的做法是包含在美国战略之中的。通过反制武器提升核优势的行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美国可能再次打出恐吓牌，针对中俄等核大国。马格多夫、斯威齐把这种策略称为“核斗鸡”游戏，美国就是其中最激进的玩家。

核斗鸡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在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

冷战后北约扩张主要设计师之一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关键人物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家安全体制继续谋求美国在欧亚的终极地缘政治霸权，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根据他的说法，这盘棋的致胜一招是将乌克兰纳入北约麾下，形成战略核联盟（尽管布热津斯基在阐述地缘政治战略时有意不提核武器因素），这将终结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可能导致其分裂成多个国家，意味着美国将笑傲全球。⁴⁷ 这种将美国在冷战后的单极霸权转变为永久性全球帝国的企图需要北约东扩，这在1997年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开始了，北约逐渐将西欧和乌克兰之间几乎所有国家吸收进来，乌克兰则是终极大奖，一把刺向俄罗斯心脏的匕首⁴⁸。在这一点上，美国主导的北约扩张战略与其核优势野心之间表现出某种一致性，两者几乎步调一致。

面对北约在乌的军事扩张，俄罗斯被迫考虑自身国家安全问题，这没什么值得惊讶的。北约扩张10年来已经吸纳了原先是华约成员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11个国家。就在《外交》杂志大谈美国接近核优势的一年后，俄总统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出震惊世界之语，明确表示“在当今世界，单极模式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⁴⁹ 尽管如此，北约依然延续其长期战略，即扩张至布热津斯基所言的欧亚“地缘政治支点”，使俄罗斯受到致命重创；北约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期间悍然宣布打算将乌克兰纳入其军事战略（核）联盟。

2014年，美国在乌克兰导演的独立广场政变推翻了该国民选

总统，由白宫指定的领导人取而代之，将乌克兰置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掌控之中。俄罗斯的回应是，在克里米亚的一场全民公投之后将其纳入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居民大部分讲俄语，认为自己独立于乌克兰之外。这次公投让他们有机会就留乌或入俄做出选择。乌克兰的政变（或“颜色革命”）导致基辅当局对乌克兰顿巴斯俄语区居民的暴力镇压，进而引发了乌克兰内战，双方是美国支持的基辅当局与俄罗斯支持的顿巴斯俄语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两个分离共和国。尽管双方在2014年签署了《明斯克和平协议》，意在结束冲突并允许乌克兰境内顿巴斯几个共和国自治，但战争在随后八年间仍在缓慢继续，在2014至2022年初之间导致1.4万多人死亡。2022年2月，基辅当局在东乌克兰的顿巴斯边境集结了13万大军，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开火。⁵⁰

随着乌克兰危机日趋恶化，普京坚持与俄罗斯国家基本安全需要有关的红线，包括：遵守先前的《明斯克协议》（由俄、乌、法、德商定，顿巴斯人民的两个共和国签署，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从而保证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自治和安全，结束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化，并一致同意乌克兰留在北约之外。⁵¹

在美国的逼迫下，北约不断突破这些红线，继续为基辅当局对顿巴斯两个共和国的战争提供军事援助，俄罗斯将此举解读为北约在事实上收编乌克兰的动作。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在顿巴斯一侧介入乌克兰内战，进攻基辅政府的武装部队。2月27日，莫斯科自冷战结束以来首次将其

核力量调整为高度警戒状态，使世界面临全球核浩劫的风险，这一次对峙双方是互相争斗的资本主义大国。华盛顿的一些人物，如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曼钦三世 (Joe Manchin III)，支持美国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意味着可以击落俄方飞机，战争极有可能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⁵²

两个方向的灭绝主义

今天，人们普遍认识到，气候变化体现了一种危及人类生存的全球性威胁。我们面临的情况是，资本主义的持续扩张依靠无节制地燃烧化石燃料，若不在几十年内彻底改革生产体系，这将导致工业文明衰落，人类将面临存亡挑战。这就是环境灭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意义。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如果世界各国希望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增幅控制在 1.5°C 以内或低于 2°C ，那么到2050年人类必须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如果不做到这一点，就会导致人类和无数物种的地球家园的毁灭。

气候变化属于更普遍的地球生态危机。与这一危机相关的是九大生态红线被突破，除气候变化还包括物种灭绝、平流层臭氧耗竭、海洋酸化、氮磷循环破坏、地面植被和森林消失、荒漠化造成的淡水资源减少、大气气胶负荷、新化合物、新遗传形式等新实体的出现。⁵³ 此外还要加上新人畜共患疾病的出现，如新冠疫情中发生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农商企业促使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发生改变。⁵⁴

然而，气候变化毫无疑问是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核心。就像核冬天一样，它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物种延续构成了威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21-22年关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物理学报告中告诉我们，即使不考虑不可逆气候变化的最乐观情形也是未来几十年的日益严重的全球灾难之一。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数亿甚至数十亿人的生命和生活环境，这些人将遭遇世界文明前所未见的极端天气事件。⁵⁵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发动有史以来最广泛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恢复他们被资本主义制度掠夺的生存条件，重建一个基于广泛平等的、维护生态持续发展的世界。⁵⁶

而灭绝。世界大国既在很大程度上不承认危及人类生存的气候变化的全面破坏性后果一样，也否认核战争对地球的全面影响。而有关核冬天的科学研究已告诉我们，核战争实际上会毁灭地球各大洲的人口。此外，如果全球变暖的程度严重到扰乱全球文明（自然科学家预测，如果全球平均气温上升4度，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到时候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将加剧，核战争以及核冬天的风险就会增加。⁵⁷今天，我们要在灭绝主义和人类生态需要之间做出选择。⁵⁸ 现在威胁人类的两大全球生存危机的病因是相同的：资本主义在有限的地球环境中对海量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霸权的疯狂追求。面对这种无限的威胁，唯一可能的回应是一场基于生态与和平的世界性革命运动，摆脱对地球及其居民的系统性破坏，走向基于广泛平等的、维护生态持续发展的世界，也就是社会主义。

备注: //////////////////////////////////////

- 1.E.P.Thompson, "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 " *New Left Review* 121 (1980): 3–31. Citations to this essay in the present article are taken from the slightly revised version in E. P. 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ntheon, 1982), 41–79. See also E. P. Thompson et al., *Exterminism and the Cold War* (London: Verso, 1982); E. P. Thompson and Dan Smith, ed., *Protest and Surviv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1).
- 2.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55; Samir Amin, *Empire of Chao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2).
- 3.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pp. 64, 73.
- 4.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75–76.
- 5.Rudolf Bahro, *Avoiding Social and Ecological Disaster* (Bath: Gateway Books, 1994), 19–20; John Bellamy Foster, *Ecological Revolu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9), 27–28; Ian Angus,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178–81.
6. 有关当前乌克兰战争起因的讨论请见 The 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 *Monthly Review* 73, no. 11 (April 2022).
- 7.Stephen Schneider, "Whatever Happened to Nuclear Winter?" *Climatic Change* 12 (1988): 215; Matthew R. Francis, "When Carl Sagan Warned About Nuclear Winter, " *Smithsonian Magazine*, November 15, 2017; Carl Sagan and Richard Turco, *A Path Where No Man Thought: Nuclear Winter and the End of the Arms Ra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19–44.
- 8.Malcolm W. Browne, "Nuclear Winter Theorists Pull Back, "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 1990.
- 9.Steven Starr, "Turning a Blind Eye Towards Armageddon—U.S. Leaders Reject Nuclear Winter Studies, " *Public Interest Report*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69, no. 2 (2016–17): 24.

10.Judith Newman, “20 of the Greatest Blunders in Science in the Last 20 Years, ” Discover, January 19, 2000.

11.Daniel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 (New York: Bloomsbury, 2017), 140. 无视热核武器攻击城市引发的火焰风暴是造成死亡的首要原因，这个看法在五角大楼是根深蒂固的。美国国防部 2008 年解密的核武器储存和管理实用指南包括 20 多页关于核武器爆炸在城市中的影响，没有一处提及火焰风暴。参见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Nuclear Matters: A Practical Guide* (Washington: Pentagon, 2008), 135–58.

12.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41–42.

13.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8, 142.

14.Owen B. Toon, Allan Robock, and Richard P. Turco,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War, ” *Physics Today* (2008): 37–42; Alan Robock and Owen Brian oon, *Local Nuclear War, Global Suffering*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2009).

15.Emily Saarman, “Return of Nuclear Winter, ” *Discover*, May 2, 2007.

16.Starr, “Turning a Blind Eye Toward Armageddon, ” 4–5; Alan Robock, Luke Oman, and Georgiy L. Stenchikov, “Nuclear Winter Revisited with a Modern Climate Model and Current Nuclear Arsenals: Still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2 (2007) (D13107): 1–14.

17.Starr, “Turning a Blind Eye Toward Armageddon, ” 5–6; Robock, Oman, and Stenchikov, “Nuclear Winter Revisited” ; Joshua Coupe, Charles G. Bardeen, Alan Robock, and Owen B. Toon, “Nuclear Winter Responses to Nuclear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he Whole Atmosphere Community Climate Model Version 4 and the 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 ModelE, ” *Journal 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2019): 8522–43; Alan Robock and Owen B. Toon, “Self-Assured Destruction: The Climate Impacts of Nuclear War, ”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68, no. 5 (2012): 66–74; Steven Starr, “Nuclear War, Nuclear Winter, and Human Extinction, ”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October 14, 2015.

18.Herman Kahn, *On Thermonuclear War*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7), 145–51.

19.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8–19; Sagan and Turco, *A Path Where No Man Thought*, 213–19. Here, the doomsday machine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the version of the doomsday machine in Stanley Kubrick’s film *Strangelove*. Yet, Kubrick’s ilm drew on Kahn’s notion and retains a concrete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nuclear reality. See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8–19.

20.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Foreign Affairs* (2006), 44.

21.Sagan and Turco, *A Path Where No Man Thought*, 215.

22.John T. Correll, “The Ups and Downs of Counterforce, ” *Air Force Magazine*, October 1, 2005;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20–23, 178–79.

23.Harry Magdoff and Paul M. Sweezy, “Nuclear Chicken, ” *Monthly Review* 34, no. 4 (September 1981): 4; Richard J. Barnet, “Why Trust the Soviets?” *World Policy Journal* 1, no. 3 (1984): 461–62.

24.Correll, “The Ups and Downs of Counterforce.”

25.Steven Pifer, “The Limits of U.S. Missile Defense, ” 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30, 2015.

26.Cynthia Roberts, “Revelations About Russia’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 *War on the Rocks* (Texas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June 19, 2020; Correll, “The Ups and Downs of Counterforce.”

27.Janne Nolan, quoted in Correll, “The Ups and Downs of Counterforce.”

28. “Excerpts from Pentagon’s Plan: Preventing the Re-emergence of a New Rival, ” 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29.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5–48.

30.Richard A. Paulsen, The Role of U.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Post-Cold War ra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94), 84; Michael J. Mazarr, “Nuclear Weapons After the Cold War, ” Washington Quarterly 15, no. 3 (1992): 185, 190–94;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46.

31.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3, 50.

32.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5.

33.Jack Detsch, “Putin’s Fixation with an Old-School U.S. Missile Launcher, ” Foreign Policy, January 12, 2022; Jacques Baud (interview), “The Policy of USA Has Always Been to Prevent Germany and Russia from Cooperating More Closely, ” Swiss Standpoint, March 15, 2022; Starr, “Turning a Blind Eye Toward Armageddon.” Estonia has cruise missiles supplied by Israel: David Axe, “Estonia’s Getting a Powerful Cruise Missile. Now It Needs to Find Targets, ” Forbes, October 12, 2021. Russia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possible reintroduction of Pershing II intermediate ballistic missiles in Europe.

34.Jaganath 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An Asymmetrical Response to U.S. Aerospace Superiority,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March 2022.

Lieber and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 48–49, 52–53; Karl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Future of Nuclear Deterrence,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1, no. 4 (2017). 中国核威慑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降低其核潜艇的声学签名也就是噪音水平。2011 年时人们认为中国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将其潜艇的声学签名降低到足以在美国的先发制人打击中幸存。然而，不到十年，中国就在这一方面取得重大进展。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47; Caleb Larson, “Chinese Submarines

Are Becoming Quieter, ”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10, 2020; Wu Riqiang, “Survivability of China’s Sea-Based Nuclear Forces, ” Science and Global Security 19, no. 2 (2011): 91–120. 2006 年利伯和普雷斯在《外交》文章中的分析招致了中俄两国的批评，也引起了两国的担忧，也推动了中俄两国核力量的复兴和现代化。然而，美国核优势野心所产生的威胁，持续困扰着中俄两国的战略规划者。参见 Karl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Nuclear Weapons, Deterrence, and Conflict, ”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0, no. 5 (2016): 31–42.

35.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16–17.

36.Roberts, “Revelations About Russia’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37.Alexey Arbatov, “The Hidden Side of the U.S.-Russian Strategic Confrontation, ”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September 2016; Brad Roberts, The Case for U.S. nuclear weapons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8.Richard Stone, “National Pride Is at Stake: Russia, China, United States Race to Build Hypersonic Weapons, ” Science, January 8, 2020, 176–96; Dagobert L. Brito,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Michael D. Intriligator, “The Case for Submarine Launched Non-Nuclear Ballistic Missiles, ” Baker Institute, January 2002.

39.Sankaran, “Russia’s Anti-Satellite Weapon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ermeasure” strategies and technologies to elude counterforce attack on a nation’s nuclear deterrence is emphasized by Russia and China, given the U.S. lead in counterforce. See 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46–48.

40.See Diane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in Paul Johnston, From Mad to Madness: Inside Pentagon Nuclear War Planning (Atlanta, GA: Clarity, 2017), 272–86.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307. 今天,美国战略圈又在热议关于美国“低伤亡”或“斩首式”先发制人打击能力, 这种能力似乎能降低核火焰风暴的可能性。参见

Lieber and Press, “The New Era of Counterforce, ” 27–32.

43.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46.

44.Magdoff and Sweezy, “Nuclear Chicken, ” 3–6.

45.Daniel Ellsberg, “Introduction: Call to Mutiny, ” in Thompson and Smith, ed., Protest and Survive, i–xxviii. It was reprinted as “Call to Mutiny, ” Monthly Review 33, no. 4 (September 1981): 1–26.

46.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319–22.

47.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46, 92–96, 103.

48.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49.Diana Johnstone, “Doomsday Postponed?” 277.

50.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 Diane Johnstone, “For Washington, War Never Ends, ” Consortium News 27, no. 76 (2022); John Mearsheimer, “On Why the West Is Principally Responsible for the Ukrainian Crisis, ” Economist, March 19, 2022.

51.Mark Episkopos, “Putin Warns the West to Heed Russia’s Redlines in Donbass, ” National Interest, December 21, 2021; Associated Press, “Russia Publishes ‘Red Line’ Demands of U.S. and NATO Amid Heightened Tension Over Kremlin Threat to Ukraine, ” Marketwatch, December 18, 2021.

52.Luke Broadwater and Chris Cameron, “U.S. Lawmakers Say They Are Largely Opposed to a No-Fly Zone Over Ukraine, ” New York Times, March 6, 2022.

53.Will Steffen et al., “Planetary Boundaries: Guiding Human Development on a Changing Planet, ” Science 347, no. 6223 (2015): 736–46.

54.See Rob Wallace, Dead Epidemiologists: On the Origins of COVID-19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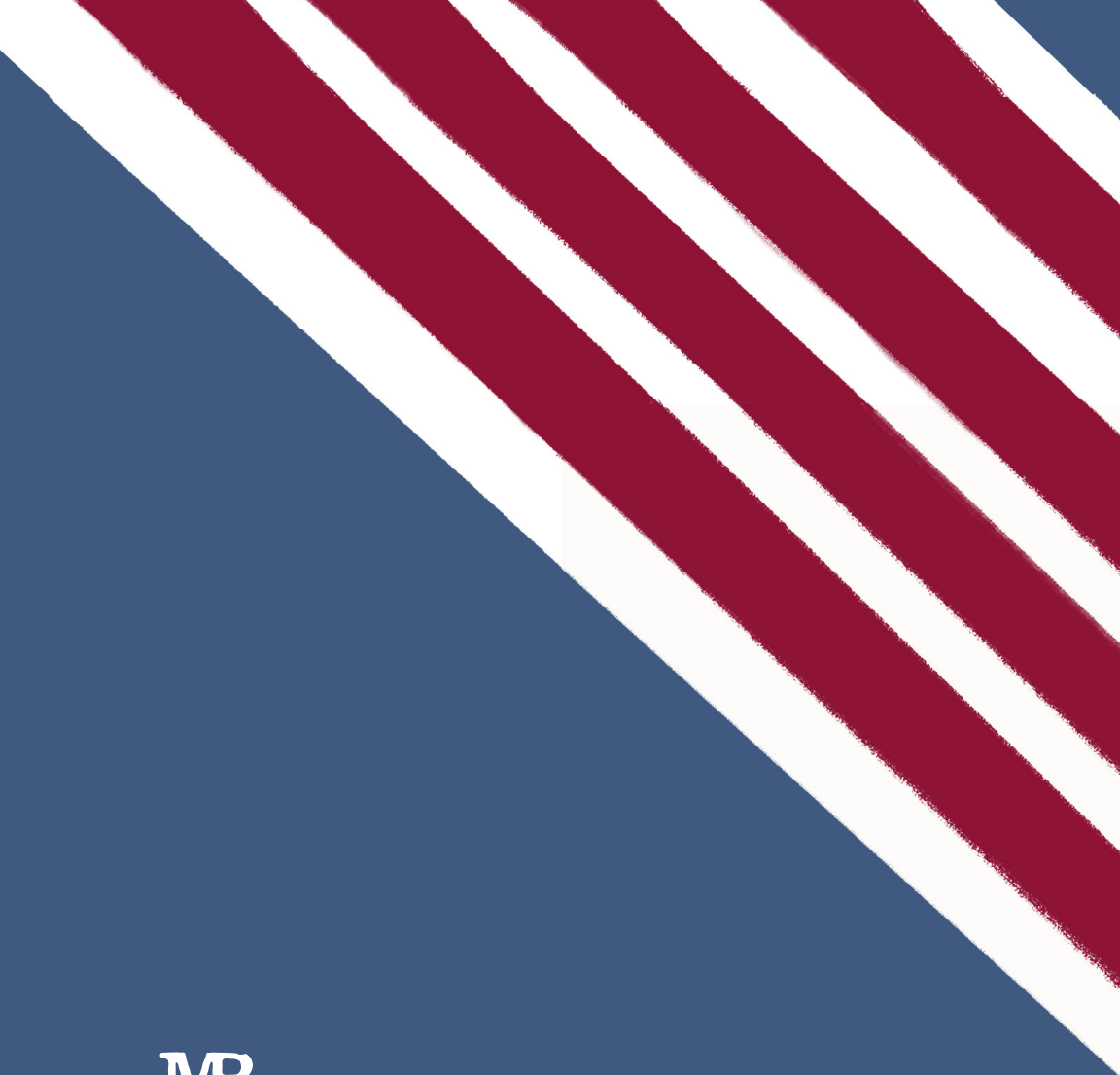
55.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

Climate Change 2022: Impacts, Adaption and Vulnerability (Geneva: IPCC, 2022). See also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 Climate Change 2021.

56. 这一结论事实上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部分（关于缓解气候变化）中科学家的最初评估是一致的。科学家所撰写的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三部分《给决策者的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于 2021 年 8 月泄露，比 2022 年 4 月最终发布时间提前了几个月。公开发表的第三部分《给决策者的摘要》（又称政府评估报告）被有关国家政府深度审查和修改，掩盖了科学家有关于缓解气候变化的主要发现。参见 Editors, “Notes from the Editors, ” Monthly Review (June 2022), https://monthlyreview.org/2022/06/01/mr-074-02-2022-06_0/.

57.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18.

58.Thompson, Beyond the Cold War, 76.



MR
PRESS

tricontinental

NO COLD WAR

STUDIES | on contemporary
dilemmas